

邓小平理论学习辅导

本书编写组

中共党史出版社

邓小平理论学习辅导

本书编写组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小平理论学习辅导/《邓小平理论学习辅导》编写组编.-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7
ISBN 7-80136-244-6

I. 邓… II. 邓… III. 邓小平理论-学习参考资料 IV.D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20976号

邓小平理论学习辅导

本书编写组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1929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35号(北门)

电话:(010)62881570 传真:(010)6288153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朝阳科普印刷厂

787×1092毫米 32开 8印张 170千字

1998年7月北京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2000册

ISBN 7-80136-244-6/D·31

定 价:12.00元

目 录

江泽民总书记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	1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	5
一、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17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的理论·····	31
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	41
四、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	55
五、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论·····	68
六、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理论·····	81
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	94
八、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理论·····	103

九、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	111
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	124
十一、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	137
十二、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政治保证的理论	151
十三、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战略的理论	165
十四、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关于祖国统一的理论	178
十五、我们的事业要依靠广大人民来完成	
——关于社会主义事业依靠力量的理论	195
十六、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和国防建设的理论	209
十七、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党	
——关于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理论	221
十八、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一百年不动摇	235

江泽民总书记在学习邓小平理论 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始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这是十五大的主题,是全党各项工作的主题,也是兴起理论学习新高潮的主题。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要同学习和贯彻十五大精神结合起来,紧紧围绕十五大的主题,在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上下功夫,在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掌握十五大精神上下功夫,把全党的思想和行动进一步统一到十五大精神上来,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进一步凝聚到实现十五大确定的任务上来。兴起理论学习新高潮,“新”就“新”在这里;抓理论武装工作要鼓劲,“劲”就要使在这里;衡量理论学习的成效,着眼点也要放在这里。

江泽民在今天的讲话中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有了邓小平理论,这是我们党最大的思想政治优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靠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以十五大为标志,我们进入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跨世纪发展的关键时期。全面完成十五大

确定的历史任务，最根本的仍然要靠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我们党处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处在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背景中，能不能及时识别和排除各种干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对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领导干部只有坚持不懈地学习和实践邓小平理论，从根本上提高自己，才能成为合格的领导者。有了一支素质较高的领导干部队伍，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才有可靠的组织保证。全党同志首先是领导干部，务必站在面向世界、实现中国跨世纪发展大局的高度，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学习邓小平理论的自觉性。

江泽民说，党的十五大以来，全党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积极贯彻十五大精神，干部和群众思想更加解放，精神更加振奋，在深化改革中大胆探索，知难而进，呈现出为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团结奋斗的新气象。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各项事业和党的建设都在取得新的进展。实践证明，十五大作出的各项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得人心的，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各级领导同志要通过学习，对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的理解和掌握有新的提高，在履行领导职责、推动改革和建设上有新的进步。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中央的决策，只有努力学习、正确理解、认真执行、坚决维护的义务，绝没有不执行、或者随意改变的权利。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关键要看行动。讲政治，这就是很重要的政治；讲纪律，这就是很重要的纪律。

江泽民强调，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我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我们认识和改造

主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对于我们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必须认真学习和实践。我们从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如果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不可能以正确的立场和科学的态度来认识纷繁复杂的客观事物,把握事业发展的规律;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避免工作中的偏差;就不可能站在时代的前列,团结和带领广大群众前进。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一定要把改造主观世界摆到重要位置,同改造客观世界更好地统一起来。

江泽民指出,领导干部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始终同党中央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增强承受、抵御各种风险意识和能力,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反腐倡廉等方面,进行不懈的努力,还要形成好的思想作风,把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同志,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群众等问题解决好。县以上党政领导班子,今明两年要集中一段时间,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有针对性地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

江泽民强调,理论学习新高潮能不能扎扎实实地兴起来,理论武装工作能不能取得明显成效,关键在于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他说,从我们事业的发展来看,我们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否认这个主流,就不能说明,为什么邓小平理论能够日益深入人心,并在实践中产生巨大力量。但是不能不看到,在一部分干部包括一些领导干部身上,学风不正的现象仍然严重地存在。有的强调没时

间学，却忙于不必要的应酬。有的学习不刻苦，满足于一知半解。有的理论与实际脱节，不会用理论武器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有的断章取义，把自己的不正确理解说成是邓小平理论的原意和中央精神。有的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甚至说一套做一套。这些现象虽然表现在一部分人身上，但害己害人，误党误国，危害极大。因此，很有必要大声疾呼，坚决反对不良学风。

江泽民指出，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目的在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好邓小平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種复杂矛盾和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不断推向前进。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大胆探索的勇气同科学求实的精神统一起来，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三个有利于”来判断各项工作的是非得失，以坚韧不拔、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去创造新业绩，开拓新局面。

江泽民最后要求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切实肩负起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党员、干部，兴起理论学习新高潮的责任。要以抓好领导干部的学习为重点，推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学习。坚持一级抓一级，加强督促检查，鼓励先进，鞭策后进。他说，几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宣传部门在党委领导下，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中央是肯定的。今后的任务还很重，希望大家再接再厉，按照中央的要求把工作做得更好。

（新华社北京 1998 年 7 月 17 日电）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 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号召全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党的十五大以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深入发展,一个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正在兴起。为进一步推动全党的理论学习,特作如下通知。

一、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是一项 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1. 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对于我们党和国家是至关重要的时期。我们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我们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要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

质。我们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继续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国际局势出现种种新变动，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当代经济和社会生活。我们既面临良好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最重要的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动摇，坚持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观察世界、发展自己的强大思想武器，作为统领全局、贯穿各项工作的灵魂，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学习和运用这一理论，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

2. 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新的形势，着眼新的实践，对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全党出现了学习理论的新气象。理论学习、研究、宣传紧密配合，党的理论建设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新局面。邓小平理论愈益深入人心，广大党员、干部运用这一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有了新进步。理论学习不断深入，改革建设不断推进，两者紧密联系，相互促进，成为党的事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的党员和干部的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还不相适应。一些同志学习理论的自觉性不高，有些同志对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党的十五大作出的重大决策在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上还有相当距离，少数领导干部学风不正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加强理论学习，重视理论指导，在党的队伍特别是高中级干部中仍然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3. 每当革命和建设的重大关头，我们党总是结合不断发展的实际，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这是

一条宝贵的历史经验。延安时期,经过整风学习,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建国初期,全党为迎接新的任务,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过去不熟悉的东西,顺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推动了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倡导全党重新学习。这次学习最重要的成果,是恢复和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过去二十年,我们党能够经受住国际国内各种各样的考验,领导人民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从根本上说靠的是邓小平理论的指导,靠的是全党认真学习和实践这一理论。今后,我们要战胜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取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仍然要靠邓小平理论的指导,靠全党深入学习、认真实践这一理论。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关系到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全党同志一定要从我们肩负的历史责任出发,按照党的十五大的要求,进一步增强学习邓小平理论的自觉性和紧迫感,努力形成学习新高潮。

二、把全党的理论学习提高到新水平

4. 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指导意义、科学体系和时代精神作了新的阐述,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解决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取得了新的成

果。这表明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必须同学习党的十五大报告紧密结合,在对邓小平理论的科学认识上,在运用邓小平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上,在改造主观世界的自觉性上都有新的提高,努力使学习和工作达到党的十五大要求的新水平。

5. 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要紧紧围绕党的十五大的主题,在全面、正确领会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上下功夫,在全面、正确领会和掌握党的十五大精神上下功夫,把全党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五大精神上来,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党的十五大确定的任务上来。

要深刻理解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只有这一理论才能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在思想上和工作中牢固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

要深刻理解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准确把握基本国情。进一步明确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进一步明确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现阶段为什么只能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始终坚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善于识别并及时排除各种干扰,毫不动摇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要深刻理解党的十五大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政治、文化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运用和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要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这些决策,特别是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在积极探索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方面,在实施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和深化改革方面,以及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方面,更要领会和把握好党的十五大精神,澄清模糊认识,避免盲目性、片面性和绝对化,把工作做得更好。

要深刻理解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宏伟蓝图,关键在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按照新时期党的建设总目标,从严治党,认真解决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从思想、组织、作风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6. 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首先要认真研读邓小平著作,并同选学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了解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实践结合起来;同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总结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结合起来。还要学习其他知识,特别是反映当代世界发展的各种新知识,拓宽我们的眼界。

三、坚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带领全党的学习

7. 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要以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和省部级干部要做学习的表率,既从总体上领会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精神,又

从各自工作的领域对邓小平理论的有关内容进行系统钻研和理解,尤其要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精髓,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努力提高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近年来新进领导班子的中青年干部,更要刻苦系统地学习邓小平理论,加强党性锻炼,增长领导才干。要认真贯彻《1996年—2000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把干部理论学习的任务落到实处。

8. 完善领导干部脱产进修制度。切实办好领导干部进修班、专题研究班和中青年领导干部培训班。认真落实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定期脱产进修,新进领导班子成员到党校、干校学习的规定。对其他各级各类干部的脱产进修,也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主管部门作出具体安排。各级党校、干校要精心安排教学计划,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抓紧成立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统筹规划教材的编审工作。

9. 健全党委(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中心组的学习要同贯彻落实中央的重大决策,解决本地区、本部门改革和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每次重点学习研究一、两个问题。要重视集中学习前的调查研究,加强学习的针对性,注重实际效果。主要领导同志要带头学,亲自抓。

10. 坚持领导干部在职自学制度。领导干部要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情况,制定理论学习计划,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要针对性地向领导干部推荐理论学习书目和辅助材料,加强对干部自学的辅导和检查。重视发挥干部理论教育讲师团的作用。通过组织研讨、交流经验、举办报告会等,促进干部学习

质量的提高。

11. 建立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考核制度。要认真总结近年来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干部理论学习进行考核的经验,逐步形成制度。要把理论学习情况作为评议和考核干部的重要内容,把考核结果作为选拔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对学习好的干部要给予表彰,对学习不好的要批评教育。

12. 今明两年要集中一段时间,在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进行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着重解决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提高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始终同党中央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增强在复杂形势下承受、抵御各种风险意识和能力,居安思危,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反腐倡廉,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等问题。县以上党政领导班子要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针对性地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对于这次集中学习教育,中央组织部要会同有关部门作出具体安排,各级党委要认真组织,分级分批进行,务求取得实效。

13. 继续在广大党员中开展学习邓小平理论、学习党章的活动,使之经常化、制度化。凡有一定文化和阅读能力的党员都要努力研读邓小平原著。对文化水平低的党员要进行通俗易懂的讲解。县(市)委党校要负责党支部书记和理论骨干的培训,基层党校要负责农村、企事业单位、街道党员的轮训。要注意区分层次,讲求实效,运用电化教育等多种形式对党员进行生动活泼的教育。

四、进一步加强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和宣传

14. 深入的理论研究,准确的理论宣传,是促进邓小平理论学习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重要条件。要坚持把理论研究、宣传同全党的理论学习紧密结合起来,使之相互促进,不断深化。各级宣传部门和从事新闻、出版、文艺、教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同志,应做到教育者先受教育,自己首先学习好,同时为研究和宣传邓小平理论作出积极贡献。

15. 重视和加强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要坚持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为重点,密切联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联系当代世界的深刻变化,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努力运用邓小平理论认识和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规律,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理论研究工作要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鼓励以科学的态度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重在建设,不搞无谓的争论。注意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对事关政治方向、重大原则的问题,要旗帜鲜明,分清是非;对思想认识问题,要积极引导,以理服人;对学术问题,要提倡不同观点的平等讨论和相互切磋。

16. 理论宣传要把握正确导向。紧紧围绕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和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针对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和学习中的难点问题,全面、正确地宣传邓小平理论,做好释疑解惑、统一认识的工作。进一步发挥党报、党刊、国家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和重要出版单位在理论宣传中的主导作

用。重视组织多学科的专家、多领域的实际工作者做好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和普及工作。切实改进文风,深入浅出地进行宣传。及时总结和介绍先进典型和先进经验,为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五、全党必须在学风上有一个明显进步

17. 学风问题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关系党的兴衰和事业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能不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是理论上和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面对一百多年来实际生活发生的剧烈而深刻的变动,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新的矛盾和问题,党的十五大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是我们党总结过去、面向未来得出的正确结论,是理论学习和整个理论建设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18.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恢复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极大地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同时也要看到,那种照抄照搬、断章取义、搞形式主义、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的不良风气,仍在党内包括少数领导干部中严重存在。这些不良风气,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败坏党的形象和声誉,窒息党的生机和活力。全党同志特别是高中级干部,必须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同这些不良风气作斗争,坚持理论与实际、学习与运用、言

论与行动相统一。

19. 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一再证明,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大发展,都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解放思想没有止境,实事求是是一以贯之。在跨世纪的历史关头,面对艰巨任务和严峻考验,更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大胆探索的勇气和科学求实的精神统一起来,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判断各项工作的是非得失,以坚韧不拔、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20. 要努力在全党造成认真学习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求真务实的风气。党内学习和讨论问题,要提倡敞开思想,各抒己见,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要随意把学习、讨论中的不同认识说成是政治倾向上的“左”或右。要把发扬党内民主同严格党的纪律统一起来,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保留和向上级直至中央反映,但不允许在宣传媒体上公开发表,也不得在群众中散布。

六、切实加强对理论学习的领导

21. 各级党委要充分认识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重大意义,把这项工作作为党要管党、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来抓。要建立健全理论学习的领导责任制,坚持一级抓一级,加强督促检查。要经常分析学习情况,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组织、宣传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各

司其职,密切配合,使全党的理论学习深入、扎实、持久地开展下去。

22.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是各级党委的重要职责。要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批政治坚定、思想敏锐、学识渊博、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要加强中青年理论骨干的培养工作,指导好各级党校、干校、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制订和实施理论人才培养规划。进一步加强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地的建设,使之发挥重要作用。鼓励理论工作者深入实际,为改革和建设贡献聪明才智;对其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给予表彰和奖励。要促进广大理论工作者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基础上加强团结和协作。

23. 用邓小平理论教育广大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是关系改革开放前途和二十一世纪国家面貌的大事,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长远大计。各级党委要有战略眼光,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要鼓励青年积极学习邓小平理论,树立远大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共青团要在广大团员和青年中深入开展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活动,加强对青年学习邓小平理论的各种组织的指导。教育部门要做好邓小平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工作,加强教材编写工作和师资队伍建设。高等学校要开设专门课程,系统讲授邓小平理论。中等学校要把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贯穿到相关课程的教学。教学要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力求生动活泼,富有成效。

24.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党组要按照本通知精神,结合自己的实际,对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作出

具体部署,认真组织实施。

中 共 中 央

1998 年 6 月 24 日

一、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在全党全国人民认真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形势下，中央作出了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决策。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要同学习和贯彻十五大精神结合起来，紧紧围绕十五大的主题，在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上下功夫，在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掌握十五大精神上下功夫，把全党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五大精神上来，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进一步凝聚到实现十五大确定的任务上来。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必将为全面贯彻十五大精神提供锐利的思想武器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一）当代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旗帜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我们党的伟大旗帜，是党的十四大特别是十五大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如同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十五大无疑将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

在 1992 年 10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党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写上了自己的伟大旗帜。

党的十四大对这一理论作出了科学的概括和评价，确立

了这一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提出了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这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迫切需要，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大措施，也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根本保证。

党的十四大以后，编辑出版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1993年11月2日，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同时，正式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决定。决定指出，这本文选，是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丰富经验的理论总结，也是引导我们继续胜利前进的科学指南。党的十四大提出，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为落实这一战略任务，统一全党思想，教育干部和人民，提供了最好的教材和最有力的武器。这个历史性的决定，引导了全党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著作，掌握精神实质，努力提高理论素养和政治水平，提高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坚定性。接着，1994年又增订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一、二卷，党中央要求把《邓小平文选》一、二、三卷作为一个整体来学习，把握理论的科学体系。1995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的通知。对《纲要》的学习，进一步推进了全党同志更好地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江泽民同志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报告在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评价的基础

上,对这一理论的历史地位、指导意义、科学内涵、时代特征作了更为深刻精辟的概括,把我们党对这一理论的认识水平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显示了我们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高举这一理论旗帜的坚定的意志。十五大充分肯定邓小平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杰出贡献,把这一理论正式确定为邓小平理论,并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行为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结果,对当代中国跨越世纪的发展具有极为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十五大之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深入发展,一个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开始兴起。为了进一步推动全党的理论学习,1998年6月,中央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通知》强调:“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最重要的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动摇,坚持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观察世界、发展自己的强大思想武器,作为统领全局、贯穿各项工作的灵魂,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学习和运用这一理论,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

伟大的革命实践需要伟大的革命理论,伟大的革命理论指导伟大的革命实践。富有理论创造精神的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

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的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方法,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指导革命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中国式的革命道路,是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开辟一条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这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由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是创立毛泽东思想的代表者,他的科学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为我们党在新时期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

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开始找到了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胜利前进。这一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它科学地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一

理论贯串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它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精辟地揭示了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原因：第一，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第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第三，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第四，总的来说，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他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

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党的十五大理所当然地要把这一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同时说明这一理论同毛泽东思想一样，“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两次历史性飞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这场伟大革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又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中，富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精神，这种精神的集中表现，就在于党中央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的事业，它呼唤着新的理论创造。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统一起来，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我们党在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没有走老路，不仅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而且避免重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创了前人未有的新路，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向前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新的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邓小平理论是发展的理论。它发展的源泉，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一实践永葆生机和活力，这一理论的发展就不会终结。党的十五大已经为我们昭示了这一理论继续发展的前景。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邓小平理论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和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考验，在当代国际风云变幻的条件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中，充分显示了这一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来看，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为科学。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的胜利发展。这个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邓小平指出：“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面对当前社会主义在国际上遇到的挫折，西方有人预言，20 世纪兴起的社会主义，将在 20 世纪内灭亡。相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社会主义旗帜高高飘扬，整个国家生机勃勃，“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生产力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也上了一个大台阶。尽管在我们前

进的道路上还有不少问题和困难，我们的工作也有过某些失误，但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依靠人民的力量正确解决前进道路上的问题和困难，而我们党的国家的进步和成就，也是人们普遍切实感受到了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

为什么中国社会主义阵地能够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中国所以能够站得住？这在于：

——我国的人民政权是经过长期的人民革命战争打出来的。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之上。“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我们有一个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的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党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所以，能够实现政局稳定，政策稳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核心是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个道理已经得到证

明,将来还会得到证明。”

——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了符合最广大人民利益和要求的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党的理论和实践的正确,是实现社会主义光明前途的关键。邓小平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就是说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

总之,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最可靠的保证。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但前面的路并不是平坦的,还会有各种困难和风险,包括可以预料的和难以预料的,来自国内的和来自国外的,经济生活中的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无论什么困难和风险,都不能动摇我们对邓小平理论的坚定信念,而只会使我们更加自觉地运用这个理论去克服困难,战胜风险,胜利前进。”这是科学地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

(四)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成果

邓小平在1991年8月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现在中国局势稳定,一个是由于坚持社会主义,再一个是由于坚持改革开放。他认为,总结经验,重点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他强调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首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理论基础。

“老祖宗不能丢”,最重要的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搞清楚”,最重要的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澄清被搞乱的理论是非,要结合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时代要求,用新的思想观点发展马克思主义,说出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话。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继承、坚持同发展、创新辩证地统一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进入了新的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度。

其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根据。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接着,从1956年到1966年,党在领导全国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许多好思想,同时,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从1966年到1976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致使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遭受严重的挫折。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拨乱反正中果断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作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地分析了错误的原因,总结了历史教训,提出了中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十个主要点，坚决地维护和继承了过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我们党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地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再次，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领导全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十多年来，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在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使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和巨大的发展。这一崭新的实践，是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的伟大创造，是党的理论发展的源泉。邓小平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热情地支持、鼓励、保护和引导群众进行创造性的实践，并领导我们党总结群众成功的实践经验，也总结工作的某些失误教训。从这些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中，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把经验上升为理论，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所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成果。

最后，当代国际局势的新发展，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邓小平科学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精辟地指出和平和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阐明了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们争得较长时间和平环境进行国内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了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这个时代的趋势，研究了世界许多

国家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这样，一方面为我们党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对外开放，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为我们党在国际局势复杂变幻的情况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观察，沉着应付，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提供了明确的指针。

我们党正是这样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总结历史，正视现实和放眼未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锲而不舍的进行理论探索，逐步形成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的：“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五）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有一个逐步形成和发展深化的过程。

它从拨乱反正的起动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产生，经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在全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路线，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组织路线。

党的十二大明确地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形成了这一理论科学体系的主题。

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制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概括了这一科学体系的十二个科学理论观点，初步形成了它的理论轮廓。

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系统地阐述了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从而比较完整地确立了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

党的十四大之后,这一理论又在新的实践中得到多方面的展开和丰富,党的十五大比较集中、充分地总结了这一理论新的发展成果,发挥和丰富了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

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是由它的基本原理构成的,党的十四大阐明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了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

这一理论贯串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这一理论的精髓,是它的活的灵魂。

这一理论的主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这一理论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说到底就是搞清楚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问题。

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形成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构成了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

十五大在肯定了十四大对这一理论体系的概括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

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是客观存在的,它集中地反映在邓小平同志的科学著作中,反映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之中。掌握和运用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关键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的理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邓小平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的进行，解决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气的法宝。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

思想路线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是一个世界观、方法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党的全部实践活动的理论基础。毛泽东用中国的语言把它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过去我们搞革命，靠的是这条思想路线，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仍然离不开这条思想路线，只有依靠它，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才能取得胜利。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

东思想的精髓。在探寻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上，王明等人不顾中国国情，靠背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本和照搬外国经验，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则提倡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认识问题的方法”，必须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独立地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正是由于毛泽东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我们党克服了在党内曾经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开辟了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精髓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所以伟大，能够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非凡胆略和科学态度，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邓小平始终提醒全党、全国人民，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在关键时刻作出的每一项重大决策，都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正是由于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使我们党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个伟大飞跃，开辟了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所

谓“精髓”就是最核心的、贯穿一切的东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它贯穿于这一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又贯穿于这一理论的各个方面。只有搞通这个“精髓”,才能深刻理解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能在实践中正确地贯彻这一理论,也才能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我们进行拨乱反正

邓小平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因此,它离不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刚刚开始的拨乱反正,遇到了“两个凡是”的严重障碍。“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其实质是要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错误,它完全违背毛泽东所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率先抵制和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尖锐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在多次讲话中反复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强调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而不能搞“句句是真理”,不能搞“两个凡是”。他坚决有力地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领导全党冲破“左”的思想束缚。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确认了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毅然

抛弃“以阶段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增强党的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政策，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邓小平在为这次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宣言书，是标志新时期开始的最重要的政治和理论纲领。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冲破长期存在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党内外思想空前活跃，各个工作领域获得了生机勃勃的创造力量。但在此期间，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给以某种程度的支持。针对这种错误思潮，邓小平又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党继续推进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清理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国庆30周年的报告，这是对建国以来历史是非的初步清理；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这是对建国以来最大的历史是非的清理；十一届六中全会专门讨论和通过了《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邓小平主持下起草的，经过全党高级干部反复多次讨论。它以实践为标准，科学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历史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基本完成。

（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我们进行全面改革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也同样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它每前进一步，都会受到陈旧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干扰，尤其是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经常不断地纠缠着人们改革的手脚。改革开放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都需要不断从思想解放中汲取动力。例如，农村包产到户的改革，从合作化以来，三次兴起，三次都被压了下去，因为它被判定为姓“资”，在长达20多年之久的时间里一直不被允许试验或被很快废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了，农民群众的这一创造才在经过试验后很快推广到全国。废除人民公社，又不走土地私有化道路，而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体制的重大问题，使农业生产摆脱长期停滞的困境，城乡人民得到很大实惠。兴办经济特区，也是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如果不解放思想，就不敢进行这种崭新试验。深圳、珠海等特区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经济特区姓

“社”不姓“资”。还有，长期以来，我们认定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逐步摆脱了这种观念，形成新的认识。先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后又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最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认为计划与市场并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两者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利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由党的十四大所确定，为 1993 年的宪法修正案所确认，这是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继续进行思想解放的重大成果。总之，正如邓小平后来总结说的：“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因此，解放思想最主要的是抛弃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的理解，抛弃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抛弃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切实际的政策与观念，真正按照“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判断标准去进行改革。

同时，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是一场具有探索性的试验。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不断地总结经验。看准了的，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指出：“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在改革过程中，也会出一些毛病，重要的是随时总结经验，特别是领导层，每年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

来抓紧解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无论是农村的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都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走过来的。“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如果只讲本本,不讲实践,不讲实事求是,我们的改革不会有这样重大的突破,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号召全党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它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实践,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四)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两大历史性贡献

邓小平在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中一以贯之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决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两个重大课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一是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二是成功地找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关系到怎样看待我们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也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这是毛泽东逝世以后我们党遇到的一个全局性的、紧迫的、至关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在领导我们党和国家摆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进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中,用极大的精力来解决这个重大问题。他指出,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

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晚年的错误是第二位的。邓小平既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又批评了借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他说，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重大错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现在回过头来看，再联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这方面的教训，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贡献！

在解决正确评价毛泽东和坚决维护毛泽东思想这一重大课题的同时，邓小平又着手解决另一个重大课题，这就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自 50 年代以来，我们党就开始进行这一艰巨探索，其间历经磨难，有成功的经验，有失误的教训，曲曲折折，反反复复。邓小平根据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和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深刻地揭示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地解决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想想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经历的艰辛探索，再

联系社会主义在有些国家遇到的挫折，这又是多么了不起的贡献！

（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是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

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呢？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和“左”的错误，造成了许多人的思想僵化或半僵化。林彪、“四人帮”的思想残余，“两个凡是”的框框，“左”的理论政策的影响，苏联模式的束缚，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原则、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使人们无法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和研究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各种新问题。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从实际出发、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一句话，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江泽民 1992 年 6 月 19 日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解放思想是一个法宝，是一个帮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永远保持蓬勃生机和活力的法宝，必须伴随建设和改革长期坚持下去。”

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统一的。邓小平对解放思想作了科学的界定：“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今后一切工作要永远实事求是，

就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解放思想。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外在地对立起来，显然是不对的。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我们的认识要随着历史的前进、时代的发展、实践的深化不断提高。但是，我们不能无条件地把一切敢想都说成是解放思想，正确的敢想是解放思想，错误的敢想叫主观臆断。同样，也不能无条件地把一切反传统的言论都说成是解放思想，破除坏的传统，打破过时的传统，是解放思想；而否定好的、优秀的传统，那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与解放思想毫不相干。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想，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分离为特征的。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注意克服主观主义、盲目性、片面性和绝对化，掌握唯物辩证法，按客观规律办事。

在当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正确认识世界发展的大势，牢牢把握全局，才能借鉴别国现代化的经验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才能把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完成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为此必须做到：第一，要善于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弄清楚我们的国情、国力如何，我们处在怎样的发展阶段，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如何，要始终注意在了解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求得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因时因地制宜的去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第二，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防止和破除各种干扰，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

问题,使思想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第三,要提倡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各级党组织都要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

(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要在领导革命和建设,坚持一切从本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问题。

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一切民族、一切国家都将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本质和特征。这对于各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具有普遍意义。每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都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都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在不同的国家中,社会主义一般规律及其本质和特征的实现形式、途径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恩格斯明确指出,他和马克思“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答案”。对于社会主义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也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都不完全一样。因此,“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

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寻找现成的答案,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实际出发探索俄国革命的道路,在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干成了十月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也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毛泽东在回顾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的时候说过:他只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认识问题的方法”,用它去独立地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具体状况,而不是从马克思的书本上去寻找中国革命道路的具体答案,因为“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由于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开辟了一条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从而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从50年代开始,我们党就一直进行着艰辛的探索,既取得了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也经历过多次曲折,付出了巨大代价。历史的经验教训反复证明,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必须强调走自己的路,而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外国的模式。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他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列宁的本本上找不出来;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离开自

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以鲜明的语言郑重宣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从根本上指明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应走的正确道路。

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新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在邓小平看来,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关键是要真正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实践,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作出了科学的回答。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首要的基本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反复地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指出:“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988年,他在会见莫桑比克

总统希萨诺时指出：“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1991年，他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邓小平在别的场合还多次论述了这个问题。他如此频繁地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了这个问题的确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首要的基本问题。

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

第一，是以坚持社会主义，老祖宗不能丢为前提的。如果抛弃社会主义，丢掉科学社会主义的老祖宗，就谈不上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丢掉了马克思，丢掉了列宁，丢掉了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中值得珍贵的东西，结果就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

第二，是针对我们对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完全搞清楚，认识不是完全清醒为前提的。如果完全搞清楚了，就不会提出这个问题。实践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犹疑和困惑，归根到底也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

第三，是针对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系列糊涂和错误观念而提出来的。要重新审视过去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传统观念，看其中哪些是合乎社会主义本质，合乎中国实际情况和时代发展的，哪些是被实践证明不合乎社会主义本质，不合乎中国实际情况和时代发展的。合乎的就坚持，不合乎的就抛

弃。

“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两个问题。前者是社会主义的再认识问题，即科学理解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前提；后者是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确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的途径。要搞清这两个问题，关键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

（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邓小平总结中国近现代历史得出的科学结论。明确了这个道理，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拯救灾难深重的国家，前赴后继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曾经向西方寻求真理，结果都失败了。这就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行不通。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通过各种主义的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先是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接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纪元。后来虽然发生过许多曲折直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

误,但最终还是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比较顺利地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使国家很快走上团结安定,健康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践中已经初步地然而又是有力地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各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在这个时期,邓小平针对社会上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实质就是要求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即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我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而又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里,要使人民摆脱贫穷、达到小康、实现共同富裕,使国家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任何力量和意志也不能违背它。

(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

在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邓小平总结多年来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道路”加以反对的历史教训,经过深邃的思考,科学地、精辟地、创造性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

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把毕生的精力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最彻底、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他们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从西欧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是从这些国家工人运动发展已经达到的实际水平出发,也是从这些国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吸收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特别是19世纪英法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积极思想材料之后,运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所得出的科学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深刻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经过资本主义到达共产主义的一般规律。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涉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时,都是限于指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和方向,而不愿意并且坚决反对规定未来社会的细节,或者回答未来实施社会主义的具体步骤。1881年,针对荷兰社会民主党打算把“社会党人取得政权后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首要立法措施应当是什么”这一问题,提交苏黎世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讨论时,马克思在一封信中明确指出: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提得不正确的。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

苏联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一国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情况下,也曾对这个问题做过一些探讨,但他当时认为还不具备条件全面阐述社会主义的特征。1918年,布哈林在俄共

(布)七大会上提出在党纲中要全面阐述社会主义的特征，列宁不同意他的意见，指出：“我们还不能阐述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我们不知道，也不能说”，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砖头现在还没有选好”，所以，“我们还不能来叙述社会主义的特征”。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这就为全面探讨社会主义特征提供了条件。

邓小平作为无产阶级的伟大战略家，不满足于既往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他一向关注事物的本质，重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讨。社会主义特征，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外部表现，是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和其它社会形态的主要标志，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概括。它虽然最终受制于事物内在的规定性，但也常常受到与之比较的参照物发展变化的影响。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容易产生变易包括误识。而社会主义本质，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理论概括，它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内部联系和内在规律性，比社会主义特征更宏观更集中更深刻，是社会主义最高层次的概念。早在 80 年代初，邓小平就使用了“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概念，提出了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的思想。1980 年，邓小平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在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后，由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建国以来的丰富经验，决定进行改革。

随着全面改革的深入发展，到90年代，论述社会主义本质的条件成熟了。1990年，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992年，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他积对社会主义长期观察，特别是对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深入思考，而对社会主义本质所作出的经典性科学概括。

（四）科学概括社会主义本质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植根于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的实际，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第一，这一科学概括，既包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问题，又包括了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问题，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首先，它突出地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纠正了过去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错误观念，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尤其是初级阶段特别需要注重生产力发

展的迫切要求,明确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还要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体现了在当代世界新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条件下,社会主义为回答资本主义严峻挑战所必须采取的战略决策。其次,它突出地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以及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指出了我们发展生产力与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根本不同。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这段精辟论述,有助于加深对以上两个层次问题的理解。

第二,这一科学概括,为我们坚持、完善和发展公有制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邓小平指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还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维护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在改革中,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归根到底只能根据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实际要求,根据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实际进程来确定。

第三,这一科学概括,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本

质特征的传统观念。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思想束缚，使我们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总之，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时代的要求，廓清了不合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模糊观念，摆脱了长期以来拘泥于具体模式而忽略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倾向，深化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这对于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推进改革，指导改革沿着合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方向发展，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五）党的基本路线反映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指明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根据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考和当代中国国情的研究，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这条基本路线的简明概括和主要内容。“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规定的，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使人民富裕幸福，使国家富强；才能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才能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两个基本点”,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才能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使我们的事业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自身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制度。改革就是要根据社会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调整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经济建设是各项工作的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也离不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统一于实现现代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邓小平认为: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概括得很好。“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我们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我国经济建设战略目标,第一步已基本实现,第二步正在实施。到下个世纪中

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和任务。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要继续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建立和健全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程序和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提高公民参政意识,保证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中得到切实的体现,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内容。社会主义不仅要实现经济繁荣,而且要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是我们党的基本方针。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是实现党在现阶段任务必须坚持发扬的革命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既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摆脱贫穷和落后的状况,非常需要我们始终不渝地发扬这种精神。

党的基本路线的这几方面的内容是相互联系的,决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它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规律,指明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因此,“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

四、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内容,是正确认识、分析社会主义,提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十分重视,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观点,但究竟如何正确划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没有提出固定的理论模式,相反一再告诫人们,要根据未来的具体历史条件和本国的国情进行具体的分析,得出正确认识。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学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是我们党制定和执行现阶段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依据。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依据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提出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在邓小平倡导下,中国共产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到十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深刻总结历史和当前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是邓小平和我们党从当代中国基本国情出发作出的科学论断。我们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最大的“实际”就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正确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我们党正确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正是全面地、深刻地把握和认识了我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基本国情，才正确地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像中国这样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时间不长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对它的基本国情应该怎样认识？从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党对此作过有益的探索。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为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个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毛泽东的这段话包括三层意思：（1）社会主义社会是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进入社会主义到建成共产主义是一个大的历史阶段。（2）社会主义这一历史阶段又可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建设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比建设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需要更长的时间。（3）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要经过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只有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极大丰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有了极大提高，才谈得上进入共产主义。

毛泽东的“两个阶段论”，并不是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

国情作出分析之后形成的结论,而更多地是从社会主义发展进程所经历的两次质变的角度所作的理论分析。这仅仅是提出了“两个阶段”的区分,而未对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作出科学的回答和说明。但是,毛泽东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发展过程,并由此提出“两个阶段”论,则可以看作是我们党后来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渊源之一,为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某种思想启示。不仅如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曾为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阐述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就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接着,他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指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可惜,毛泽东在国情认识上的成果没能得到坚持和发展。

总的说来,从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党对我国基本国情的认识,一直处在不完全清楚的状态。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曾一度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种对我国基本国情所作出的错误判断,导致了1958年“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轻率发动,错误地要求积极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途径,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一大二公”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丧失了经济发展的良机。在较长的时间里,我们又认为我国社会主

义社会仍然处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激烈斗争的“过渡时期”。这种错误判断,使我们在较长的时间里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热衷于搞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忽略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党和国家遭受巨大损失和挫折。对此,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说来,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正确决策。在此情况下,如何进一步认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大发展,防止重犯已往的错误,就成为一个首要的问题。深入研究我国的基本国情,确认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的课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邓小平在1979年3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中,明确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是底子薄,现在的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二是人口多、耕地少,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1979年9月,叶剑英在建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它不成熟、不完善。1980年,邓小平在谈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这些论述,虽然未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但关于这个理论的基本内涵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1981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

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首次使用了这个概念。这个决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和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都再次提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重大的理论命题。十三大前夕，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初级的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以此为根据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战略、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等任务。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后不久，邓小平在一次接见日本友人的谈话中，充分肯定了党的十三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历史功绩，指出：中国共产党十三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即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

我国社会要经历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其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按照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应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社会发展的总规律

和一般规律,并不排除个别国家发展阶段上的特殊情况。由于社会发展的种种具体原因,历史上有的国家可以越过某个或某些社会发展阶段而出现某种跳跃式的发展。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前提,既决定了我国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又决定了我国不能超越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直接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

中国自身的贫穷落后和帝国主义的入侵,使近代中国由一个缓慢发展的封建社会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畸形发展道路。这就决定了:第一,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夹缝里,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力量十分弱小。由于反帝、反封建双重革命任务艰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革命势力的强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人民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从而使中国按照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走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道路。第二,由于上述社会历史原因,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受压迫最深、革命最坚决、最有组织性和战斗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身上。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不仅仅担负着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且担负着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任务。由此决定,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继续把革命向前推进,取得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一切说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而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状况,又决定了我们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

去实现别的一些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以弥补我们的先天不足，改变我国生产力落后，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程度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的状况。

中国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但为什么又不能逾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呢？这是因为，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一个渐进的历史积累过程，社会化大生产是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和确定的，不可能随着社会制度的逾越而跳跃，更不可能随着人们意志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强制其跳跃和变化，只能是拔苗助长，适得其反。50年代曾经提出的“十五年赶超英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口号，导致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的教训，人们至今记忆犹新。这充分说明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必须经过一个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是不可逾越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历史阶段。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水平高，已基本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社会化、商品化、现代化，因而这些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就不必经历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至于其它国家如何认识自己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那是这些国家自己的事情。前苏联、前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自己所处阶段有过不同的阐述。这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对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有所启示的：（1）必须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多级的发展过程，要经过若干阶段才能达到共产主义。（2）必须科学地确定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准，划清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与建立、建成社会主义之间的界

限,不能把它们混同起来,不能降低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3)必须把社会主义看作是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充分认识建立社会主义、完善社会主义是很艰巨的任务,不能犯急性病。(4)必须从本国国情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出发,实事求是地估计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不能简单化,估计过高,急于求成。应当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既是科学认识我们自己的国情的基础上提出的,也是在正确研究国际有关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不能把这一理论强加于加别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应当尊重这些国家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应当肯定,我国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的。正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增长,国家综合国力有了很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的方向,是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是中国进一步繁荣昌盛的保证。偏离社会主义轨道必将使中国出现倒退。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曾经出现许多偏差失误,但这并不能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恰恰相反,是我们没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的表现。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发达的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不成熟,尚有许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艰巨复杂的问题亟待解决,社会主义优越性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还不是很“够格”。只有全面地把握这两层含义,才能同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划清界限。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会产生“左”的错误,相反,就会产生右的错误。

“左”、右两种错误的根源都在于不能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处在何种发展阶段，在于没有把握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之所以在实践中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它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客观事实，防止和克服了“左”、右两种错误。

（三）当前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从根本上来说，当前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一方面，就社会性质来说，我国社会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具体说：第一，确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开始探索各种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形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第二，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我国，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已经建立，并不断巩固、发展。我们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有参与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权利。我们建立和不断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民主政治制度，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良好的条

件。人民民主专政有效地保卫着人民的民主权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第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已由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变为中国人民的强大思想武器,已为全党和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所接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已经在我国建设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得到了体现,并且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品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有了普遍提高。第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教育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些主要工农业产品的总产值居于世界前列。

另一方面,就发展程度来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不发达的,还处在初级阶段。具体说:第一,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主要表现在我国物质技术基础落后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程度不高,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严重的不平衡。经过四十多年的建设,尽管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一些重要的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已跃居世界前列,综合国力的位次稳步上升,教育文化事业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由于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我国 12 多亿人口,9 亿人口在农村,主要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农业机械化程度和现代化程度还比较低。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学技术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相当比例的状况同时存在。第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不成熟不完善。生产力的落后和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

在生产关系方面,不仅存在着多种形式的公有制,而且存在着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还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还占相当比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在上层建筑方面,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已经建立,但由于经济文化落后和长期封建影响等原因,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具体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还很不完善,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实现依法治国还需要作大量工作。我国已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但封建主义思想残余、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并且经常侵袭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品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也还需要艰苦的努力。所有这些状况说明,我们今天仍然远远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十五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

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是由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决定的。我国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形态的变革,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生产力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但由生产力低的起点达到比较发达的水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只能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地走向成熟和完善。如果不顾生产力需要一个较长时间发展这一客观实际,凭主观愿望任意求快,或者急于变革生产关系,其结果只会束缚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给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损失。从英、美、法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来看,实现现代化一般需要二百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发展快的如日本,也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而且它们的发展是以本国人民和殖民地人民的巨大痛苦为代价的。我们依靠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依靠党的正确领导,依靠全体人民的艰苦奋斗,同时借鉴外国成功的经验,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就能够用较短的时间走完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几百年的路。这已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所证明。但是,也应当看到,我们说的较短的时间是比较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而言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经过多少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这个过程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深入学习邓小平的这一论断,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紧迫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有更加充分的思想准备,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

五、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论

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他曾多次提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现在，全党全国人民要横下心来搞建设，“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

（一）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任何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物质基础，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也必须注重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例外。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为将来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必须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尤为突出和迫切。

首先，社会主义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从我国国内的具体情况来看，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彻底摆脱这种贫穷落后的局面,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坚持不懈地发展生产力。我国虽然经过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但和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相差甚远,至今仍有一部分属于贫困地区。中国人民所以革命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消灭贫困和落后,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邓小平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使人民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唯一的途径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其次,社会主义要优越于资本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然而,由于我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起步晚,建国以后,曾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产生过偏差,使我国的经济比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有很大差距,与周边的某些国家和地区比较起来,也有一定距离。如果我们不能保证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快一些,综合国力更强一些,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更高一些,人民就会在比较中产生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怀疑乃至信念的动摇。因此,我们在目前乃至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必须加快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根本保证。我们党执政四十多年的经验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能不能巩固和发展,关键在于共产党执政后,能否制定一条符合本国国

情、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反映客观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自始至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共产党领导人民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人民生活仍然处于贫困状况，那么，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地位就会动摇。曾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超级大国的苏联，之所以发生剧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忽视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忽视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失去了群众基础。这个教训应当永远记取。

第四，社会主义要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它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达到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才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达，没有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怎么搞按需分配？马克思主义讲的共产主义是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生产力不断发展，最后才能达到共产主义。”

（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是经济建设

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和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它不仅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而且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方向，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创造性发展。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方面的发展都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要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物质基础和基本前提；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就在于它的生产力能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因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只能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一论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阐发。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中，第一次引入了生产力的范畴，明确地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与运动中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揭示了生产力发展在这一运动过程中的决定作用，纠正了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上的偏颇，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得出的重要结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经历了曲折。我们的问题，在于在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的一个长时期里,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仍然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而没有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忽视发展生产力,因而在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指导上发生了严重的失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他还说:“中国社会实际上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作为“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确定以经济建设为工作中心,是以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为根据的。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后来发生了“左”的错误,从根本上说,是背离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邓小平对历史经验和我国国情作了科学分析,明确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国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在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一步

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十五大强调，“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当然，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是，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对于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必须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正确地加以解决。否则，也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发展生产力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离不开发展；振兴中华民族，使中国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离不开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离不开发展；解决国内各种问题，保持稳定局面，做到长治久安，离不开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离不开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离不开发展；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和平统一祖国，离不开发展。归根到底，“发展才是硬道理”。

（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

邓小平从1990年开始，一直强调要加快发展。从担心经济滑坡，提出要力争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到指出要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一直到1992年初视察南方时提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他特别强调

要抓住机遇。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他提醒我们：“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他还说：“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邓小平把我国的发展放到了整个国际环境的对比中，这对于提高全党全国人民的认识，解放思想、开阔眼界，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抓住当前有利时机，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对我们是有利的。“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这是邓小平在透彻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后得出的正确判断。在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两极、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处于一个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总的趋势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国际形势中又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新特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许多事情已力不从心，对外政策四处碰壁，引起一系列双边关系危机；俄罗斯与西方矛盾加大，双方之间拉开了一定距离。美俄在中欧、东欧、中亚争夺势力范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西方国家之间矛盾上升，在经济领域的磨擦更为激烈；亚太地区迅速崛起，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上升，西方国家加强同亚太国家的关系。所有这些，都使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的和平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世界大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打不起来。这就为我国加速经济发展，提供了十分有

利的国际环境。

我们国内的形势也是好的。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有良好的国内条件。邓小平说:“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有“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还在于目前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都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已经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基础。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对我国跨世纪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正确结论,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规划了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宏伟蓝图。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全党和全国人民全面贯彻十五大精神,自觉维护全党和全国工作的大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向改革和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中,思想更加解放,精神更加振奋,方向更加明确,步子更加坚定,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这突出表现在:

第一,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重大改革取得基本成功。财税、金融、外汇外贸、投资、价格和流通体制,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等各项改革,都已按预定方案顺利推行。这些重大改革的平稳实施和协调运行,促进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建立,初步形成了以计划、金融、财政和相互配合和制约的宏观调控体系,标志着我国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以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为目标和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正在逐步展开,探索前进,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

第二,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势头。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有所加强,产业结构和新产品结构进一步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继续保持发展的势头;城乡市场繁荣兴旺;科技教育和文化事业都有了新的进步。

第三,在伟大而深刻的社会大变革中保持了社会稳定。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维护稳定工作,采取加强舆论引导、认真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等多种有效措施,确保各项改革的平稳过渡;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坚决查处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的大案要案。经过上下的齐心协力,全国局势平稳,为改革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第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步伐加快,法制建设被摆上了党和国家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工作位置上,立法工作成绩显著,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明显提高,国家机关的执法、司法水平有所改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开始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总之,现在我国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各条战线进一步展现出蓬勃向上的新局面。所有这些,都为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内条件和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

当然,我们在发展问题上,也面临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竞争中占有优势的压力。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国际事务中经常出现不平等、不公

正现象的主要根源,是世界最主要的不稳定因素,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进步的最大制约因素,是策动和加剧一些国家政治动乱的主要外部条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集中表现为个别国家或少数几个大国企图主导世界,凭借其经济和军事实力争夺世界霸权,对外进行扩张、侵略、剥削和掠夺;利用经济制裁和军事干涉来干预别国事务;利用“和平演变”手段,对各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攻势;在外交活动上,打着“人权”旗号,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对于发展中国家,利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种手段进行渗透、威胁和直接干涉。可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障碍。国际社会中的争霸斗争,无一不是以实力为出发点的。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就要受制于人。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经济强国,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动地位。才能顶住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各种压力。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从总体上看显然处于不景气状态,但是他们通过“自我调节”和“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通过发展高新科技,仍然保持着经济增长势头,其综合国力仍保持领先地位。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高科技浪潮的兴起,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将高新技术作为综合国力的重心所在。他们通过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来提高国际竞争能力,通过推进高科技产业化,争夺世界竞争的制高点;通过实施大科学研究计划来增强后劲等各项措施,使其在世界经济、科技竞争中仍占有优势。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高新技术已经成为带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制高点。知识经济和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谁在高科技领域占优势,谁就将

掌握政治、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我们只有把高新技术开发作为战略主攻方向,把高新技术发展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提高科技地位,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总之,我们必须正确估量国际环境对于实现我们战略目标的有利和不利因素。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抓住机遇,珍惜机遇,用好机遇,集中精力千方百计发展社会生产力。

(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振兴经济的关键在振兴科技

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也包括科学”。邓小平站在时代与历史的高度,以其敏锐而宽阔的战略眼光,非凡的气魄和胆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并创造性地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由此出发,他提出、并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一系列有关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思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思想体系。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抓整顿时就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1988年,他深刻地概括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新的命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反映了科学技术在当代发展的新形势和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又强调指出:“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推动改革开放，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重要指导思想。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的依据在于：第一，科学技术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在生产力的劳动者是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的主体。但是任何生产劳动都是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的结晶。在现代生产过程中，重要的不是看劳动者的体力如何，而是看他的智力如何，即掌握科学技术的程度如何。劳动者的智能越高，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越大。因此，用科学技术武装劳动者，提高劳动者的科技素质，就可以大大提高劳动者的生产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科学技术可以创造和改进生产资料中的劳动工具，从而决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力的规模和整体的综合水平。第三，科学技术可以扩大劳动对象。它可以使劳动对象不断扩大开发利用的范围，增加劳动对象的品种，并使之不断材料化、精细化，变单一利用为综合利用，使经济效益猛增数倍乃至数十倍。第四，科学技术可以优化生产要素之间的组合、改善生产过程的管理。总之，历史已经证明，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将最终导致生产能力、生产方式以及管理方法的巨大变革；每一次由新技术革命导致的产业革命，都伴有相当数量和比例的新产业的产生和幼稚产业的兴盛，同时出现一批老产业的衰落；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周期越来越短，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越来越大，在现时经济、社会发展中，科技正发挥着第一位的作用。正是基于科学技术的这种特殊的作用和地位，邓小平才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

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命题相联系，邓小平提出了“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等一系列战略思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充分反映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思想，《决定》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符合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科技与经济密切结合的新型体制，促进科技进步，攀登科技高峰，以实现经济、科技和社会的综合协调发展。”这是我们党纵观世界全局，认真总结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经过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得出的深刻结论。

六、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理论

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理论，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我们不仅要深刻领会“三步走”的战略步骤，而且要深刻领会与此相适应的发展的战略重点问题、发展的速度问题、以及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和先富带后富的关系等基本问题。

（一）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生产力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是实现工业化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开始建设的，它的起点很低。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必须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邓小平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情况，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作出了明确而又科学的部署，这就是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我们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就注意了从战略全局和发展远景来考虑经济问题，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当时缺乏社会主义建

设的经验,后来在指导思想上又出现了的“左”的错误,在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的选择以及实现目标的方法和道路上,都曾经有过失误。50年代我们有过“15年超英赶美”的战略。1964年三届人大提出重点转移,并确立了分两步走的战略目标,宣布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75年四届人大再次重申了这一目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经济战略部署并没有得到真正贯彻执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也开始了新的转变。1979年12月,邓小平会见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中提到了本世纪末中国经济发展的设想,即人均收入1000美元,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据邓小平后来回忆:当时大平首相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当时,我告诉他,是不是可以确定这样一个目标,到本世纪末翻两番。197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50美元左右,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就是人均1000美元。”这是邓小平首次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加以定量化。根据他的这一设想,1982年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明确了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并提出从1980年算起,前十年打好基础,创造条件,后十年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

随着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形势的进一步发展,1984年到1987年间,邓小平继续对我国中远期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精心设计。他提出:到下个世纪中叶,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达到人均4000美元。这就基本形成了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思想,为决策部门科学地确立现代化建设的

目标与步骤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

党的十三大报告根据邓小平论述的基本思想,提出了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上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党的十四大又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近期和长远的三个奋斗目标,即在 90 年代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第二步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到建党 100 周年时,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样的基础上,到建国 100 周年时,就能够达到第三步经济发展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党的十五大再次重申了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突出强调了世纪之交实施这一战略的重点和要求:“从现代起到下世纪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努力实现‘九五’计划和二〇一〇年远景目标,为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分“三步走”这个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科学性在于,它既防止了急于求成,又防止了消极保守。一方面,它表明我们制定的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拿本世纪要完成的两步来说,第一步已经实现。第二步要求在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6% 到 7%, 这个速度不仅低于近几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 10% 以上的速度,而且比过去 30

多年平均每年增长8%多一点的速度也要低一些。因此,实现第二步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是完全有把握的。至于说第三个目标,即到下个世纪再用50年时间,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这就要求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约为3%到4%。要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持续保持这样的速度并不容易,但考虑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越来越成熟,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巨大潜力,应当说是有可能实现和留有余地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有了本世纪翻两番的基础,“再争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有希望的。”

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中国人民的雄心壮志。要实现再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必须达到7.2%,这样的速度不是轻易能够达到的。从全世界范围看,从1961年到1980年这20年间,发达国家发展速度超过7.2%的只有一个日本,其余都远远低于这个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00美元上下增加到4000美元左右,美、英、法、德等国一般都用了200多年时间。日本发展比较快,也用了一百几十年的时间。而新中国从成立到下个世纪中叶,要提高到4000美元左右,这就意味着中国人民要用100年左右时间的艰苦奋斗,走完发达国家200多年或一百几十年所走过的路程。因此,这个战略目标是比较高的,是鼓舞人心的。

(二)实现“三步走”的战略重点

为了更好地实现“三步走”的战略,邓小平提出了以重点带动全局的思想。1982年9月,他提出战略重点有三个: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

反复强调：“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农村富起来容易，贫困下去也容易，地一耕不好农业就完了。”这就是说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业发展状况如何，对国民经济全局关系重大。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 12 亿人口、农村人口占 80% 的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农业的基础地位和重要作用尤为突出。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都有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农业是人们的衣食之源，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农产品数量和质量的要求也日益增高；农业又是目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在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奋斗目标激励下，农民要求从农业中获得更高经济收益的愿望日益强烈；农业提供的许多农产品都是工业的重要原料，在相当大程度上制约着工业尤其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的发展。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必须充分重视和努力发展农业，始终把加强农业放在各项经济工作的首位，使农业能够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此外，关于中国农业的长远发展战略，邓小平还提出了两个飞跃的思想：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下去。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能源和交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突出薄弱环节。我国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滞后，严重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就能源工业来说，一方面由于“七五”时期煤炭和石油投入不足，建设规模未达到计划要求，影响了 90 年代继续增产的能力。另一方面又由于一般加工工业增长过快，使能源短缺更加

严重,成为“瓶颈”产业。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工业发展受到了强烈制约,整个经济规模扩大也受到强烈制约,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基础工业的建设。同能源工业相比,交通运输对国民经济的制约更为突出。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动脉,必须优先发展。在世界近代经济发展史上,交通运输的每一次大的突破,例如火车和轮船的发明,汽车和飞机的发明,都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的发展又是开拓市场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前提。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的发展,将使我国国民经济的“瓶颈”制约得到缓解,而且是打破地区封锁和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的物质基础,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条件。交通运输业的产业关联度高,应该成为长时期的主导产业之一。能否妥善地解决这些矛盾,不断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和下世纪初的经济振兴。为此,我们就要特别注重大力发展能源工业,并优先发展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事业。

教育和科学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无论是农业的发展,能源和交通通讯的发展,还是整个经济的现代化,最终解决问题都要靠科技和教育。邓小平一再强调:科技和教育,各行各业都要抓。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发展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他还尖锐地指出:“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

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这就是说,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大计。众所周知,在生产力的诸因素中,人是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社会主义现代化,说到底,要靠有社会主义觉悟、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有熟练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去建设。因此,从根本上说,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都取决于全民族素质尤其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各种专门人才的培养。教育正是提高民族素质、造就现代化建设专门人才的摇篮。在这一意义上讲,当今世界的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智力开发的竞争,而归根到底是教育的竞争。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是在认真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借鉴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我们党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要发展。当前我国的教育事业从总体上讲还是落后的。我国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还不足5年,还有2亿多文盲、半文盲。如果我们再不抓紧时机发展教育,就会延缓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对教育的认识,高度重视教育的战略地位,努力保证教育事业的发展,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

(三)以“台阶式”的发展实现“三步走”的战略

为了更好地实现“三步走”的战略,邓小平提出了“台阶式”发展的思想。他在1987年10月会见匈牙利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有一篇谈话,题目是《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谈到了发展的速度问题,他指出:“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

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其中“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这一论断是邓小平首次提出的新观点。他还说道：“我们提出要搞建设，搞改革，争取比较快的发展。”

进入 90 年代以后，邓小平非常重视经济发展抓住时机上台阶的问题。这是因为在 90 年代，我们能不能抓住机会，发展自己，进一步促进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以新的面貌进入 21 世纪，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他又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上述思想是邓小平在 1991 年 8 月《总结经验，使用人才》的谈话中提出来的。以后，他的这些论断又在 1992 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得到系统的发挥。

邓小平为什么要提出抓住时机、经济发展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思想呢？首先，抓住有利时机，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迫切需要。本世纪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全面高速增长的时期，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发展速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从国际经验看，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曾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个高速发展阶段。现在，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加快发展，向我们提出了严重挑战。80 年代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高达 9%，但亚洲“四小龙”年均经济增长率也达 8%，预计 90 年代还将保持在 7%

至8%左右的速度。90年代要保证我国与亚洲“四小龙”及其他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差距不拉大,并有所缩小,就必须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优谁劣,最终还要由经济发展来回答。如果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不快,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会遇到极大困难与威胁。因此,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其次,当前是争取经济加速发展的有利时机。从国际上看,尽管各种矛盾和冲突不断发生,世界仍不安定,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美苏争霸世界的两极格局已经终结,世界正向多极化发展,我们可以争取较长一段和平环境来发展经济。目前,尽管发生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但是从总体上说,亚太地区仍然是世界上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全面改善,对我们沿边实行开放发展贸易十分有利。在世界范围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国际间产业结构正处于调整和重新组合之中,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前景依旧看好,大量剩余资金和先进技术需要寻找新的市场。从国内来看,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都上了一个新台阶,为经济的加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极大地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综观国内外形势,90年代是我国加速发展经济的有利时机。正如邓小平所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

最后,我们必须走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邓小平提出的“台阶式”发展的思想,并不是

鼓励经济的发展要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地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和高指标,而是仍然强调社会主义经济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协调发展。在协调发展的基础上,一旦出现条件好的时机,就要牢牢抓住,充分利用,加速发展,使经济跃上一个新台阶。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况不同,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各自的条件确定适当的发展速度。有条件的能发展快一些就快一些,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能发展的就不要阻挡。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应努力争取经济发展有较快的速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才提出,我国的经济发展,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我们要走出一条速度快、效益高的经济发展新路子,就必须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解决两大课题: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邓小平关于“台阶”式发展的论断,深刻阐明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极端紧迫性和重要性,对于我们利用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多上几个台阶,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四)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如何调动亿万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社会革命。对此,邓小平提出了一条独到而又含意深刻的途径,这就是从物质利益入手,打破大锅饭,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此来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人的富裕,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早在 1978 年 12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

就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速地富裕起来。”他还指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以后，邓小平又在不同的场合对这个问题作了多次的阐述。

邓小平之所以反复强调这个经济工作中的大政策，主要是因为以下几点：

首先，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符合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我国地域辽阔，既存在着地理和自然条件的差异，又存在着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差异，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我们只能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帮助、支持不发达地区和边远贫困地区的发展，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走向共同富裕，这是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也是整个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沿海地区历史上经济就比较发达，发展经济的自然条件比较好；华侨比较多，有利于吸引华侨投资。此外，文化教育水平较高，海陆空交通便利，金融、商业、能源、电讯等基础设施都比较好。而内地及边远地区的基础和条件就差一些，除了自然条件不如沿海以外，工农业生产比较落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也不够发达，金融、商业、交通、电讯等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吸引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比较困难，经济水平和发展速度明显低于沿海地区。这种差别的存在，决定了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按同一

时期以同等的速度富裕起来。面对这种差别,我们只能从实际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起来以后,一方面,可以提高综合国力,使国家有条件帮助和支援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它们的示范作用,带动其他地区逐步富裕起来,最终走向共同富裕。

其次,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当前,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商品生产者之间按照优胜劣汰的规则进行竞争,各劳动者之间、各企业之间、各地区之间在收益上必然出现或大或小的差距,先富后富,富多富少不会完全一样。这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因为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地区,不是人为规定的,不是国家下达的“计划”,而是以经济发展状况和各地的实际情况为基础的。如果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用计划经济的办法人为规定各地区的富裕程度和速度,将各地拉平,那么就会抑制人们生产和参与竞争的积极性,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也无法达到共同富裕。

再次,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即以劳动作为同一尺度衡量每个劳动者,主要根据劳动者的劳动成果的多寡、贡献大小确定分配数额。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态度的不同,所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存在着较大差别,因而收入有多有少,富裕或快或慢,这是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如果我们不承认这种差别,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劳动者的报酬不以劳动成果的多寡、优劣来决定,那么就

会倒退到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的状况,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就会被扼杀,社会就会陷入普遍的贫困之中。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无法实现。

最后,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总是波浪式前进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而是先富帮后富的过程。同步富裕是小生产者的幻想,这种幻想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平均主义。实践一再表明,平均的结果不是平均富裕,而是平均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可能导致任何意义上的发展,只有通过一部分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树立起建设的榜样,才能影响其他人、其他企业、其他地区,带动和帮助他们发展,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最终实现“三步走”的战略部署。

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

改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和总政策，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由于改革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因而它既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革命，又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它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用“三个有利于”标准判断是非，衡量一切；需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保证改革事业的顺利进行。

（一）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开放也是改革。

二十年来，改革已从农村的改革推进到城市的改革，从经济体制的改革推进到政治体制的改革，从经济基础的改革推进到上层建筑的改革，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改革使被旧体制束缚的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促进了经济的巨大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成为富民强国、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废除政企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在保持土地公有的基础上，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

新体制。这种体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赋予了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利;改变了以往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使农民的劳动与收入直接联系起来,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家庭联产承包制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非农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它吸收了大量“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促进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它为农民致富和农村逐步实现现代化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极大成功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挑战。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围绕国有企业、价格、宏观管理等三个方面展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这样就使改革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由局部走向了全面,开始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阶段。与此同时,党中央相继决定对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进行改革。扩大学校办学的自主权,改革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促进教育同经济的密切结合。完善科技与经济有效结合的机制,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也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依据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随后在党的领导体制、干部人事制度、党政机构精简等几方面开始了致力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调动积极性的改革尝试。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我国各方面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政治上,提出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

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便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有一个稳定发展的政治环境。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着重作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划。党的十五大又进一步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并对未来几年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作了具体部署。

(二)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

改革是一项全面而崭新的事业。早在1978年10月,邓小平就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的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经济的需要”。针对改革对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对人们思想观念产生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1985年3月,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改革之所以被称为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第一次革命而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推翻了剥削和压迫人民大众的旧制度,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制度,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是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革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包括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把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从扫除发展社会生产

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这一点来看;从两次革命的最终目的相同这一点来看,即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今天的改革也可以叫做革命性的变革。然而这种革命性的变革,又不同于过去那种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导致社会制度大变动的革命。在阶级对立社会中,由于社会的基本矛盾表现为剧烈的阶级冲突和斗争,这种冲突和斗争又直接体现在对社会根本制度和国家政权的冲击和维护上。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主要任务是推翻反动的国家政权,实现社会形态的更新。现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其基本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方面。因此,改革并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使它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也与“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截然不同的。那种“继续革命”,在经济上,是不断地强化超越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不断地强化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治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地揪“党内走资派”,企图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来解决所谓的社会矛盾和党内矛盾。这种脱离现实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的所谓“革命”,不仅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反而造成了经济的倒退和破坏,社会的混乱和停滞。

邓小平正是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以及建国三十多年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

他方面的体制。这就要求,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必须坚持,对社会主义具体体制,则要进行根本性变革,而不是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这种根本性的变革,必然广泛地引起社会生活和人们观念的深刻变化。改革与传统革命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革命是革反动阶级的命,是打倒反动阶级,而改革则是革旧体制之命,是制度创新。这就决定了,它既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又是中国的一次全面而崭新的新型革命。

(三)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地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的。在这一矛盾运动中,生产力不仅是决定性的因素,而且也是最活跃、最不停顿的因素。革命的任务就是要通过解决社会这一基本矛盾,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而推动社会的不断前进。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社会的基本矛盾表现为你死我活的阶级冲突和斗争,因此这种对抗性的矛盾,只有经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才能解决。所以,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那么,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社会发展的动力又是什么?毛泽东正确地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运动状况。他认为,正是这些矛盾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但是,对于这个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和基本国情的判断,却出现了失误。毛泽东认为,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所以要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要用抓革命、促生产的手段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对于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

的问题，主要在于所有制不公、不大、不纯，因而要不断地变更生产关系，强化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对于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问题，主要在于“党内出现了资产阶级”，因此要开展“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实践证明，这种做法的认识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全党总结了历史经验，在肯定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提法基础上，对其具体表现形式作出了新的阐述。认为，社会基本矛盾在当前的主要表现，是发展生产力与僵化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科教体制等的矛盾。对此，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这一矛盾，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所以，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这样，邓小平就既坚持了毛泽东观点中正确的一面，又纠正了其观点中不符合实际的一面。从而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个长期未解决的重大问题，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

（四）改革是一个大试验

改革是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书本可翻，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学，没有铺好的道路可走，全靠我们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开拓前进。改革就是要冲破过去那种僵化封闭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如果一切事情都按原有的章程办，都靠老办法，都等上级的具体指示，没有一点敢闯、敢“冒”的精神，必然冲不破旧体制的框框，摆脱不开本本的束缚，也就走不出一条新路子，干不出一番新的事业。因此，必须坚持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必须勇于实践；敢于冒风险；必须允许试验，允许出现反复。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往往需要经过多次试验，反复比较，才能找到符合实际的道路。我们切不可因为怕担风险而左顾右盼，等待观望，陷入新的思想僵化之中。

由于人们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不同，所受的教育和经历不同，因而人们对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必然要经历一个较快或较慢的认识过程，与此同时，残存于人们头脑中的各种旧思想，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靠一两次思想教育就能除掉，而必须通过亲身实践，经过反复体验、独立思考，才能真正得到改变。因此，对群众中出现的种种不同认识、不同看法，既不要搞强加于人，也不要搞争论，让大家在实践中看，让事实说话，让实践来教育人。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教育人的过程。最终说服人的还是要靠活生生的现实。只有经济发展上去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才会从切身感受中看清是非曲直，才会心悦诚服地拥护党的方针政策。

（五）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

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都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

邓小平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结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是吃穿住行。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物质生产便成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

展的前提和基础。基于这个道理,生产力就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成为判断社会历史进步的最高标准。“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谁主张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谁就是搞修正主义。这种离开生产力的发展空谈社会主义原则的谬论,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头脑,窒息了人们的思维,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建设上来之后,鲜明地提出了生产力标准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标准,使人们从僵化的思想束缚下解放了出来,大胆地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新步伐。

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衡量改革,一方面我们不能把那些合乎“三个有利于”,本来姓“社”的东西,错误地判定为姓“资”而加以排斥。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无论是改革初始阶段还是现在,都没有否定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这本是姓“社”的产物,然而有人却说,这是走单干道路,是资本主义的个人发家致富。引进外资、成片土地承包给外商,这本来并未影响社会主义的性质,却被斥为“出卖主权,丧权辱国”。发展乡镇企业,有人说的不正之风的风源;建立经济特区,有人说是资本主义的试验场,等等。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那些合乎“三个有利于”标准,然而既可为“资”所用又可为“社”所用的东西,错误地加以排斥。例如:市场经济体制,这本是人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不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然而我们以前却对此讳莫如深,生怕一沾上它,就演变成资本主义。股份制、私营企业、证券市场等的出现也都经历了多多少少的磨难。

(六)改革要依靠人民群众

改革是亿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情，只有人民群众真心实意地参与，才能取得成功，达到目的。邓小平非常强调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因为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聪明才智和力量，只要他们理解改革，积极支持改革，并投身其中，把自己的命运与改革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就能够产生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作为领导者，只有尊重群众、爱护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制定出符合群众愿望和要求的方针、政策，才能把改革的方案举措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也才能引导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从而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实践已经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改革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在人民群众之中，只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我们的事业就一定能够胜利，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八、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理论

对外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一百余年,中国人民历经奋斗,在获得独立、解放之后逐步地学会了如何实行对外开放。借鉴、利用、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要有一个正确的方针。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两者辩证的统一,不断研究和解决对外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以把中国的对外开放长期而持久地坚持下去。

(一)对外开放是当代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对外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规定,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就包括了坚持对外开放长期不动摇。邓小平在谈到对外开放这一国策时明确地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人类社会愈向前发展,全世界范围的经济就愈加融为一个整体。这样,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闭关自守地向前发展,世界性经济的发展规模,也不允许有任何国家走闭关自守的道路,促进经济发展的诸

多因素,诸如资金、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原材料市场、劳动力市场、销售市场、生产结构,都需要有一个全世界范围的合理配置和合理流动。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了,谁会合理利用这些因素,谁就发展得快;相反,谁闭关自守,谁就落后,最终会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对外开放,是经济发展规律本身的一个客观要求。

把对外开放,立为治国强邦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中国共产党正确探索经济发展规律的一个生动表现。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格局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的历程。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兴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作为率先开放的窗口和试验区,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开始了新中国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试验,几年之间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人民从四个特区的发展上,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世界精彩的发展和变化。也正是从特区的建设上,中国人民获得了启迪,随着四个特区的发展,又相继开放了沿海十几个城市,并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了大面积的经济开放区。随着开放步伐的逐步加快,80年代末,依据海南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的条件,批准海南建省并设定为经济特区。之后,党中央又决定开发开放浦东、开放沿江、沿边城市和全国各省省会及一些有条件的城市,从而全国范围的对外开放的格局基本形成。

对外开放,给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首先,它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打开国门,中国人看到了世界上发达国家物质文明的先进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进步,看到了自己的落后。知“耻”而后勇,中国人民决心努力奋斗,迎头赶

上去,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现代化的国家。其次,它使中国人逐渐地学会了在现代化建设中“以人之长,克己之短”的本领。国外的资金、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这些东西,本身没有什么阶级属性,中国人民在对外开放中,逐渐冲破了自己的思想禁区,不断扩大了对外开放的领域。于是,国外的资金引进了,投资项目引进了,先进管理经验借鉴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了。这样一来,活跃了中国的经济,给它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二十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迅速发展、成效显著,实行对外开放,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因之一。

中国的对外开放,既包括对发达国家的开放,也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是对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开放,它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开放,还包括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开放,是对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全方位的开放。

发达国家,有先进的东西,同时,也有许多不健康不利于我们民族发展的东西,发展中国家,同样也有许多先进的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事实上,把目光只盯住某一国家,是不会有多大的成效的。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博采世界各国之长,补己之短。正因为如此,中国在对外开放中才表现了最大的包容性,不断地荟萃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精华,增添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色。

(二)对外开放是历史和现实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对外开放政策的提出,首先是对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深刻总结的结果。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走上了闭关自守的道路。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同外界接触,发展水平逐渐地落在了世界一些国家的后面。与此同时,西方一些国家却完成了由封建制度到资本主

义制度的质的飞跃,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样,在总的发展水平上,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出现了差距,而且差距越来越大。终于有一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从1840年开始,一百多年间,资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把中国搞得百孔千疮。中国人民吃尽了苦头。闭关自守,只能使中国贫穷落后。而贫穷落后,结局只能是被动挨打。

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中国人民争得了完全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们本应当及时地打开国门,迎接世界的挑战。可是,一些错综复杂的原因,使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同世界大多数国家相隔绝的状态。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结果对中国的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进入新时期以后,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我们应当学会利用国际条件,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以寻找一条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

今天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邓小平说:“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把自己封闭起来,连信息都不灵,只能越来越落后。因此,只有坚持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必要的互接互补,加上我们自己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不断创新,才能赶上时代,赶上当代世界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基于这样一种观察和认识,党采取了主动对外开放的方针和政策。

实践的发展,又使党日益坚定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和逐步完善了对外开放的政策。人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是一个由实

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这样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制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打开国门后,几个经济特区的并行发展,显出了蓬勃的生机。党总结成功的经验,吸取其中的教训,加大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只几年时间,党就把对外开放确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纳入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实践中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

(三)对外开放不会导致资本主义

实行对外开放,对待外来的东西,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方针。今天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以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里,首先面对的是,必须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

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许多历史性的文明成果。应该看到,这些成果标志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夸大它和否认它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相比较之下,社会主义作为后起的崭新的社会制度,虽然具有无限的生命力,但它毕竟经历时间较短,而且有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是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样,时间短、基础差,就使得今天在物质文明成果和科学技术方面相比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着很大的差距。

社会主义要想早日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必须大胆借鉴、吸收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来的全部文明成果,结合新的实践进行新的创造,为自己所用。这样,才能加快发展,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过去长时间内，我们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往往只看到或更多地看到的是社会主义同它对立和斗争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社会主义同它还有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因此，在执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中，我们必须兼顾到问题的两个方面，切勿采取形而上学的观点和方法。

对外开放，会不会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这一直是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的答案是明确的：我们的对外开放不会导致资本主义。

长期以来，人们中间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认为学习西方，引进西方的文明成果，就类似于发展资本主义。这是一个错误认识。因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是不带社会阶级属性的。在这一点上，应当是见好的就要，就吸收才对。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是在落后的基础上起步发展的，本来就落后，见到别人好的东西你不再学习，那么如何能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呢？学习资本主义好的东西，不等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全世界应当是一个尺度，向好的看齐，向先进的学习。社会主义学习资本主义是为了发展自己，超过资本主义，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不应否认的是，对外开放，确实使资本主义的一些腐朽东西进入中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但这并不可怕，比起对外开放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效果来，消极因素毕竟要小得多。无论怎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将占主体地位，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长期不懈地开展清除资本主义腐朽东西的消极影响和反腐败的斗争，加上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可以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保证。邓小平指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吸收外资,合资经营,不可能损害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权,只会有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再过30年、50年、70年,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更加发展了。等到那一天,社会主义的主体经济发展得更强大,它就更不怕遇到挑战和冲击了。

(四)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坚持对外开放的统一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及时实行对外开放。新中国建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国际上仇视封锁新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很多,加上中国共产党还缺少经验,诸种因素加在一起,造成了中国只能和社会主义阵营打交道,以至出现了学习苏联“一边倒”的历史局面。50年代末、60年代初,因为主权和其他问题,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僵局。当国际上出现了可以和别的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机会的时候,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使我们错失了这种机会。

这一发展阶段,给我们的收获和教训是: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是统一的。无论如何也不放弃自己国家独立自主的权利;对外开放要善于抓住机遇。机遇错过,是不会再来的。要学会和各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打交道。要学会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学习各国之长,无论如何不能再出现“一边倒”的格局。

1978年以后,开始了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并且正在向更高的水平健康发展。

总结经验,中国人民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两者的辩证统一,中国的发展才会大有希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但

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它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在坚持对外开放同时，必须头脑清醒，决不可忘掉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决不可损害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权益，决不可放任任何各种腐朽的、有害于人民的东西自由泛滥。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长久政策，本世纪内不能变，下个世纪的前50年也不能变。50年以后，中国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得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更不可能改变。中国人民，将坚定地实行对外开放，直至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今天，中国的对外开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但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党内腐败行为的滋生和发展也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我们不能沉醉于对外开放的大好局面。如果腐败现象控制不住，对外开放照样会导致另一种结局。这一点，绝不可忽视。有很多问题需要进行反复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逐步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来。

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景是光明的，中国人民有决心，有信心也有能力把自己的祖国建设好。

九、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和新贡献,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极为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

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根据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要求和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特别是他1992年初南方谈话的精神,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从原则上指明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后,又将这一目标写入了党章和宪法。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和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设想社会主义将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并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马克思所讲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后来人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指生产力高度发达、实现了单一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在自身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计划调节和按劳分配的

社会，是阶级和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已经消亡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将没有商品、货币，由商品经济发展为产品经济。

列宁在 1906 年也曾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为对立的两种基本社会制度来看待。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曾把商品经济、货币关系、价值规律等视为资本主义的范畴，一度试图利用“战时共产主义”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体制“直接过渡”，“消灭货币”，尽快创造条件，实行由计划直接支配的产品经济。但是，由于社会主义不是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而是首先在俄国这样经济落后、资本主义不那么发达的“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上首先建立，所以，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面临的情况，在许多方面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不同，生产力水平低，根本不具备消灭商品、货币，实行产品经济的条件。列宁总结了这一时期的经验和教训，从 1921 年春开始，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在 1921 年 12 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上确定：“俄共（布）在经济方面的基本任务，就是领导苏维埃的经济工作：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些探索是很可贵的。但由于列宁在世时苏维埃俄国还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时期，这种探索只是刚刚起步，而且缺乏系统的理论准备。1924 年初，列宁去世后，这种探索中断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又占据了统治地位，从此形成了一种传统观念，即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搞社会主义只能实行指令性的高度集权管理的计划经济。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在某些方面向苏联学习，也曾实行过高度集权管理的计划经济。对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某些弊端，在党的八大前后，我党已经有所认识，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已经对“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由于认识还没有彻底突破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在“左”的指导思想的不断干扰下，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也只是在中央和地方行政分权的框架中反反复复，而没有根本的突破。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以后，商品经济、市场调节几乎就成了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被视作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经济根源，因而不断遭到严厉批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全国展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我们党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开始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经过十多年的艰苦探索，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和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适应全国财经统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集中力量进行初步工业化建设的需要，我们逐步建立起全国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当时条件下，曾起过重要作用。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体制在生产力水平不那么高，产业结构比较简单，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较低，需求比较单一，或战时状态以及遇到特大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可以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使

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发挥较好的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产业结构越来越复杂,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需求日益多样化,这种体制中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就逐渐显露出来。加之后来又把发挥市场作用,发展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措施当成资本主义加以反对,使得我国经济体制之过分集中统一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改革开放,在社会主义经济活动中不断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增强市场机制的功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农村,取消了人民公社和统购统销,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抓紧农村流通体制的改革,加快了农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

在城市,为使国有企业进入市场,采取了一系列逐步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和转换经营机制的措施。从贯彻各种简政放权的规定到《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出台,从总体上看,多数企业已经开始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自主决策的权力,可以根据市场供求变化来调节自身的经营活动。

在价格方面,我们进行了调整和放开价格的改革。如果说使企业具有经营自主权是创造市场行为主体的必要前提的话,那么放开价格,则是使市场主体通过竞争取胜的重要条件。十多年来,我们针对各种不合理的比价关系,采取先调后放、调放结合的措施,初步形成了市场价格随供求状况自动升降的机制。在农业生产方面,指令性计划已经取消,除对棉花

还实行国家收购调拨,对粮食还实行国家合同订购一部分的办法外,其他农副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基本上都是由市场调节。在工业总产值中,实行指令性计划的部分,已由过去的占95%以上减少到占10%左右。在全部社会商品中,由计划决定生产的生产资料产品的比重已降至30%以下,而消费品已不到10%。

在流通方面,我们改变了统购包销的单一流通形式,建立了多渠道的流通网络。随着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的自主权的扩大,自销、选购、产销一体化的流通形式应运而生,初步形成了以国有商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参与的流通体制。搞活流通体制,为商品市场的形成创造了重要条件。资本市场开始形成,劳动力市场对人才流动起了积极作用。为市场交易提供服务的各种组织已经出现,并开始发挥作用。

我们初步建立了宏观的间接调控体系,发挥了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的调控作用;改革税收体制,发挥了税率对财务分配的调节作用;改革投资体制,拨改贷,开始用经济手段为主要手段来控制投资;初步建立和健全了各类法规。

我们发展了对外经济关系,建立了经济特区,开放了沿海城市 and 内陆省会城市,开放了沿海、沿江、沿边等地带,特区经济蓬勃发展,对外开放从沿海向内地扩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与国际市场的衔接,开始按国际市场的一般规则处理涉外经济关系。

上述改革使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大大增强。事实证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区、行业、企业,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正是这十多年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为我们提出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实践基础和客观的事实依据。

(三)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十多年来理论探索的成果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逐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个转变,遇到了认为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的障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实践,使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化大生产所必需的。这就要求我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勇敢地探索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个探索过程是一个不断克服“左”的思想影响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也是一个对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的不断深化的过程。改革初期,我们破除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调节对立起来、把指令性计划等同于计划经济的观念;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并在实践中付诸实施;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并随之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逐步完善市场体系,使改革逐步深化;党的十三大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计划与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论断,还特别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使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功能大大增强。90年代,随着改革的深化,我们党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成熟和深化,比较深刻地认识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的重要性。这为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

供了坚实思想和理论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对创立这个理论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他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科学地总结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对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等作出了一系列极为深刻精辟的论述，对于我们最终选择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尽管当时这是讲计划经济为主，但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邓小平高度评价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1987年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进一步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

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党的十三大报告强调了计划与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不再提计划经济为主。

1990 年底和 1991 年初,针对一些人对搞市场经济仍有担忧,怕市场搞多了会出问题,导致资本主义,邓小平再次强调: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

1992 年初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就对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长期争论不已、阻碍我们前进的问题,作了一个清楚、透彻、精辟的总回答,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视为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

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一系列论述,江泽民在和中央一些同志交换意见的基础上,于 1992 年 6 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中,主张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明确确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解决了一个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勾画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和基本框架。

(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同于过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这一新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抽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我们要依据客观规律的要求,大力发展全国的统一市场,进一步扩大市场的作用,并健全科学的宏观管理体制与方法,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规和必要的行政管理,搞好计划指导,引导市场健康发展。

这一新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体制,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它具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性,在它规范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在运行规则上是相通和相似的。因此,我们应当注意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一切有用的知识和经验,遵循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共性的东西,如:承认企业和个人等市场主体的独立性,使它们自主地作出经济决策,独立地承担决策的经济风险;建立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体系,由市场形成价格,保证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由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的作用;建立起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对市场运行实行导向和监控,弥补市场经济本身的弱点和缺陷;制定完备的经济法规,保证经济运行的法制化;遵守国际经济交往中通行的规则

和惯例。

但是,也要看到,迄今为止,市场经济总是与特定国家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不同国家的市场经济不能不具有各自的特性。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因而也必然形成一些自身的特点。这主要表现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在各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的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的条件下运行;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关于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特别是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紧密相联系的认识,十五大作了高度的概括,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这里,用了四个“坚持和完善”,把市场经济同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之间的关系,阐述得清清楚楚。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不能割断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联系。而把握这种联系的关键,是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体经济可以体现共同致富原则，可以广泛吸收社会分散资金，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公共积累和国家税收。要支持、鼓励和帮助城乡多种形式集体经济的发展。这对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作用意义重大。

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

和鼓励。

在分配制度上和经济目标上,我国的市场经济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即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保障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护劳动者和企业的知识产权,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取缔非法收入,对侵吞公共财产和用偷税逃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牟取利益的,坚决依法惩处。整顿不合理收入,对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的,必须纠正。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等新税种。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又一个重要特征。

在宏观调控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共处。在当今世界上,取得成功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一般都不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强有力的国家宏观调控,有着强大的政治优势,政府将通过经济社会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能够创造一个稳定的、安全的和公正的社会环境,以确保市场经济的有序进行。为搞好国家的宏观调控,当前,特别需要注意更新传统的计划观念,改进计划方法,重点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搞好经济

发展预测、总量调控、重大结构与生产力布局规则，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点建设，综合运用经济杠杆，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总之，政权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有共产党领导，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有共同富裕的目标，有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国家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也能够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有成效，更成功。

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

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科学地阐明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意义、任务和方法，为我们指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正确道路。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

政治体制是实现社会根本政治制度的具体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它包含这样两种含义：一是构成政治制度的具体组织形式、结构，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组织体系和社会系统。二是这个组织体系和社会体系的运行机制，即：它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则进行运作的，或者说它的运作受制于什么样的规律。

政治体制与政治制度，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定的政治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的性质，决定了相应的政治体制的形式和内容。而一定的政治体制，又是为决定它的政治制度服务的。但是，政治体制与政治制度的这种统一并不是绝对的，也不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政治体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具有反作用。我国既有的存在弊端的政治体制，就有碍于我国政治制度所固有的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也有碍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因此，要和谐政治体制与政治制度的关

系,就必须进行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是对存在弊端的原有政治体制的革命。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管理体制、工作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加以革除,以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邓小平称之为“兴利除弊”。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决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而不是止于对原有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一再强调指出:“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我们坚持发展民主和法制,这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他还说:“我们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他又指出:三中全会以来国内政策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根据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党的十三大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党的十四大继续提出:“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

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是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都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的正确定位,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的指导原则。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我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属性,适应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它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有民主的政治。其根本前提,是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之所以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愈益紧迫的现实需要的。即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政治体制改革是防止“文化大革命”一类严重事件重演,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治本之策。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就原则性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他强调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80年8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一讲话被党的十三大称作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总结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文化

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教训，深刻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邓小平认为，必须革除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即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他非常精辟深刻地阐明：过去我们犯错误，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以邓小平的讲话为先导，我们党逐步开辟了一条依靠制度建设，而不是“人治”和“搞运动”，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路。

政治体制改革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紧迫要求，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保障。从1986年起，邓小平非常突出地从加速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出发，接连不断地呼吁全党充分认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指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邓小平的这一系列论述，极为充分地揭示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互相依赖的紧密联系，切中要害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难于深入，就在于存在弊端的政治体制的障碍。由此告诉人们：改革是全面

的,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紧迫需要和切实保障;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大体同步,两者相互依赖、相互配合。

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非常及时地鲜明地强调了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指出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这显然也适用于十三大报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他还根据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需要,提出“搞廉洁政治”,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并且指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他还说:“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些论述既表明了邓小平坚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发展深化。

(三)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和任务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目标之一就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民主,从来是我们党奋斗的基本目标之一。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英勇奋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中国历史上,人民第一次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的新篇章。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之一,就是没有及时地以此为契机,把民主政治建设推向新的时代高度,没有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对民主的重要性和如何发展民主的问题形成了新的认识,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摆到了社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战略位置上。而这，正凝聚着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远见卓识。他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他还提出：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除了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外，就是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为此，他进一步提出，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总之，民主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要政治目标之一。

我们要建设的民主政治，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任何国家的民主，都离不开其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制度。所谓只有具体的民主而没有抽象的民主，其首要含义在于谁是民主的主体，即什么人享有民主。邓小平反复强调指出：“什么是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呢？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由此出发，他进一步指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不能走西方的道路。他一再讲：“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们实行的民主不是搬用西方的民主。”“我们必须进

行政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决不能照抄西方以及任何别国的模式，而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道路来。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建设民主政治，一个基点就是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根本优势。邓小平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现阶段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基本渠道。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继法国巴黎公社和俄国苏维埃之后，由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尊重中国各族人民的意愿，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创造的又一种新型的政权组织形式。它既根本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三权鼎立”，也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而提出的“议行合一”。它是当代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民主的一种伟大创造，已经在中国民主政治的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和完善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切实加强国家权力机关的建设，便利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建设民主政治，还必须着力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最广泛的政治基础。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是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它根本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有别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一党制。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创造，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体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人民政协是我国人民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共产党领导的实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是要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和改善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加强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与协商，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作用，举荐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在人民政协中的作用，同时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

（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有效地维护和保障人民的各种权利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制度的有效维护和保障下,我国人民享有广泛而切实的民主权利。我国人民不但拥有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他方式参政议政的权力,而且享有法律所赋予的其他各项权利。随着改革开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人民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显著增强,积极性、创造性空前高涨,使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充满勃勃生机。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政治生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生动活泼、健康向上。这正好验证了邓小平的这样一句话:“调动积极性就是最大的民主。”

如同世界上没有抽象的民主、自由一样,世界上也没有任何超越时空的人权。人权总是一定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首要的问题,是人权的性质问题,是什么人享有人权的问题。是压迫者、剥削者、强权者的人权,还是广大劳动人民的人权?邓小平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指出:“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权利,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他谴责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其次,在当今中国,实现和保障人权,放在首位的是生存权、发展权。不致力于发展,不致力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去追求什么形式上的民主之类的人权,那就不要说实现小康,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就是连最起码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果真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资格侈谈人权?

与人权相联系的是国权。国权是实现人权的前提,没有国

权也就谈不上人权。邓小平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自鸦片战争以来曾经因丧失国权而受尽凌辱的中国人民，对邓小平的话是有深切体验的。我们不会用自己的人权观念去强求别人，也决不允许别人以人权为借口来损害我们的主权、国权。

（五）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民主和法制不可分，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他强调“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他还说：“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社会主义法制是由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以及由此所建立的法律秩序的总和。它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意志的集中体现，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可靠保障，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法律化，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强大法宝。不要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决不是社会主义法制；不要

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也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民主与法制并重,两者紧密结合,是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战略指导方针。

在如何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上,邓小平有一系列重要的见解。他提出:必须加快立法工作,逐步完善,不要等待“成套设备”;必须健全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进行教育,根本的问题是教育人。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必须有完备的法律来引导、规范和保障。法制经济即经济关系广泛法制化的经济,意味着法律成为规范和调整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手段。我们必须加快经济立法工作,强化经济法规的执行和监督的力度,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党的十五大丰富和发挥了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其最终的成果,就是确立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其要点是:第一,法治的主体、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体是人民。依法治国的客体首先是国家事务。依法治

国的核心和实质,就是要凭靠国家法制来保障人民的权力。第二,依法治国的客体是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是治国而不是治民。第三,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理国家,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成功实现的根本保证。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关键也在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这三者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第四,依法治国的根据是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第五,必须严格执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依法治国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人民依靠法制的权威,通过法制的途径,实现和保障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的国家治理形态。这一方略的确定,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史上新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开始进入了更加崇尚法治更加重视法制建设的新阶段。

(六)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所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邓小平指出:“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

首先,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发展并达到既定目标的根本保证。加强党的领导同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是完全一致的。党的领导的实质,就是组织和支持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实现党的领导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重大决策,都完全是为着人民的利益的。而人民的当家做主,又必须通过党来组织、引

导、支持,才能实现。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邓小平强调说:“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使国民经济更难发展,使人民生活更难改善。”

同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还必须有序有步骤地进行。民主的发展,永远不能脱离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和国民的素质水平。民主化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急于求成只能适得其反。邓小平指出:“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他还说:“所谓有秩序,就是既大胆又慎重,要及时总结经验,稳步前进。”他一再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周密研究,审慎行事,稳步展开,而不能一下子大于,影响社会的稳定。他一贯认为民主的发展要以稳定为前提。他明确说:“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

1987年3月,邓小平提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这三条,是邓小平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出发,鉴于社会生活最基本的方面与政治体制的关系,总结国内国外政治体制的成败得失而概括的。这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权衡利弊得失的依据,也是衡量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效的标准。

十一、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在探索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的过程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这反映了党对国情的深入把握和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

（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

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篇祝辞，和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一起，成为我们党最早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任务的重要历史文献。邓

小平在这里不仅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而且是把这种精神文明的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和要求之一摆到总体布局的战略地位上的。精神文明建设所具有的这种战略地位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说明,社会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其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这三个基本层次构成的系统结构。一定的社会形态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生产力之上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有机统一体。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还包括与这种经济、政治相适应的思想文化,这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因此,可以说正如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就没有社会主义一样,如果没有适应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精神文明,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或者说至少是没有完整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有自己的精神文明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特征。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在存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人类还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社会主义才开创了自觉创造自己历史的文明时代。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与生产力的发展相直接联系的科学文化获得了高度的发展。但是,如马克思所说的,“技术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

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蠢的物质力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对抗性质造成了科学与衰颓之间的对抗,也决定了这个社会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社会主义在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可以有共同的理想和道德。这个社会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自己生产的目的,致力于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固有本性,也是社会主义其他特征的共同要求。这种精神文明,既批判地继承以往社会的包括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又反映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下人们的精神面貌、社会风尚的新特征。换一个角度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不仅要有日益发展的物质生活、民主政治生活,而且还要有日益发展的精神生活。不建设好精神文明,就不能全面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只有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然社会是一个系统结构,那么建设社会主义也就必然是一个系统工程。其目的是整体性的,其任务是综合性的。党的基本路线用规范的语言表达了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实现物质文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三位一体的奋斗目标,就必须相应地进行这三个方面的建设,并且使其相互配合和促进。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生产的落后,既表现在物质生产上,也表现在精神文化生产上。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必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本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同时它的建设又是建设物质文明、民主

政治的文化条件和思想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而要较快地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在当今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中最活跃、最重要因素的条件下,不加强科学文化建设,是不可能的。在我们这样一个有 12 亿人口、资源相对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对于实现现代化就更具决定意义。为了发展生产力,还必须实行改革开放。“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因此,越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越是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就越需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以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邓小平强调指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指导方针。精神文明建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必须从这样的理论高度和政治高度,来认识精神文明建设的地位和意义。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全党同志必须从这个总体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它必须是围绕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

神文明建设。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指导方针。

(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根本任务是培育“四有”社会主义新人

我们党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和根本任务。邓小平指出,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渗透在物质文明建设之中,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体现在人的身上,就是要培育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要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来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人民又是两个文明建设的主体,人的素质是历史的产物,又给历史以巨大的影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要靠人来建设的,只有不断提高人的素质,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培育和造就社会主义需要的一代又一代新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结果。

思想道德建设,要解决的是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在“四有”中,邓小平特别强调有理想和有纪律。我们党

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在现阶段为实现这个共同理想而奋斗，对共产党人来说，也就是为实现党的最高理想而奋斗。邓小平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有效地把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凝聚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上来。

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是要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邓小平说：“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实现现代化需要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文盲半文盲较多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更加迫切需要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

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密切相联，“四有”缺一不可。有文化，就是要有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是社会主义新人思想道德素质方面的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中心的思想道德，是精神文明的支柱、灵魂和核心，决定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方向和性质。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既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科学文化知识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成为人们的精神力量。发达的教育科学文化基础有利于实现先进的社会、政治理想。我们要全面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培养一代又一代既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又有高度的思想觉悟、道德风貌和组织纪律观念的社会主义新人。

(三)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发展社会主义一切事业的指导思想,文化建设不仅不能例外而且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历史和现实的事实证明,要保证我国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特点和方向,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保障学术自由是统一的,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才能正确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学术和艺术的指导作用,遵循学术和艺术发展的规律,繁荣科学文化事业。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民族的。文化的发展不能割断历史。我国是有几千年文明发展史的国家,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化财富,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贡献。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要继承我国各民族历史上的一切优秀的思想道德和文化成果,更要着重发扬五四运动以来党领导人民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在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创造。否定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就不可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而要建立这种新文化又必须在继承基础上进行创造,充分体现时代精神。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决不是闭关自守。文化上的对外开放和交流,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只有努力吸取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一切优秀的思想和文化成果,才能建设起有中国特色的更高、更好的社会主义文化。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不是颂古非今;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不是照搬照抄。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继往开来。

(四)坚持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

精神文明重在建设,是我们党一再强调的一个重要方针。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将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精神文明重在建设,是由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精神文明的发展,是要靠扎扎实实的建设才能实现的。我们要坚持一切着眼于建设,把注意力集中到团结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上来,集中到满足人民的文化和精神需要上来,集中到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上来。

重在建设,就是把建设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立为本,持之以恒,贵在落实,务求实效。邓小平强调指出: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我们应当高度重视理论建设,保障学术自由,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创造性地开展研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加强理论队伍建设,重视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培养和提高。要按照“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为此,要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事业的有关经济政策,繁荣社会

主义文化。要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邓小平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经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努力求得社会效益同经济效益的统一。对于那些毒害人们特别是青少年身心健康、败坏社会风气、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种丑恶现象，必须坚决扫除。

精神文明重在建设，要有相应的物质保障。精神文明建设要同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国家和社会要保证精神文明建设所必要的财力物力，并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应增加投入。还有必要建立起精神文明建设的激励机制。

（五）重视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保证。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地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扬。

新时期一开始，邓小平就告诫全党：“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这项工作，各级党委要做，各级领导干部要做，每个党员都要做。”后来他又强调：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他还说：“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如果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至少也必

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上，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1989年3月，他鲜明地指出：“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有了这个传统，我们就能抗住腐败现象，老干部就能管好他们的子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

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是要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教育，加强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思想道德教育。邓小平提出，要加强还必须“改善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他说：“对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流行的影响社会风气的重要思想问题，要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由适当的人进行周到细致、有充分说服力的教育，简单片面武断的说法是不行的。群众关心的实际生活问题和时事政策问题，各级领导一定要经常据实讲解，告诉大家客观的情况以及党和政府所作的努力，并且对群众所反映的不合理现象及时纠正。群众从事实上感觉到党和社会主义好，这样，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才会有效。”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得有针对性、细致深入和为群众所乐于接受。“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凡是需要动员群众做的，每个党员，特别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党员，必须首先从自己做起。”要建设好一支精干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以热情为群众服务的行动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来赢得群众信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向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国正经历着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这是我国改革中最具革命意义的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改革的深入,社会生活中一系列进步的新观念逐步形成,积极变革、勇于探索、注重实践、开拓创新的精神日益发扬;广大群众学文化、学科学、学技术的积极性自觉性不断提高。同时,在新旧体制转换中也产生一些消极现象。因此,必须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许多观点,就是针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提出来的。1996年10月,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着重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作出了新的理论阐述和正确结果,对新形势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要求。

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就要正确认识和研究市场经济给精神文明建设带来的新情况、新任务、新课题,把建设精神文明和发展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应当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有精神文明建设的配合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中,精神文明建设必须起推动和促进的作用。一方面,发展市场经济不同时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市场经济也发展不好;另一方面,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不考虑发展市场经济这个现实生活的实际,精神文明建设也不会富有成

效。因此,我们思考、研究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时应采取的基本态度或者说思路,就是要紧密结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实践,通过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自身也获得发展。要实现这样的有机结合,就要求我们努力探索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途径、方法和措施,使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风貌、精神状态和科学文化素质,随着市场经济的拓展而获得提高。这是一个重大课题,也必然表现为一个过程。

根据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根据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精神文明建设总的指导思想,也是精神文明建设总的要求。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在全体人民中提倡为人民服务 and 集体主义的精神,提倡尊重人、关心人,热爱集体,热心公益,扶贫帮困,为人民为社

会多做好事,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在经济活动中,国家依法保护企业和个人利益,鼓励人们通过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获取正当经济利益;同时引导人们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反对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反对损公肥私、损人利己。严格防止把经济活动中的商品交换原则引入党的政治生活和国家机关的政务活动。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大力倡导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的社会公德,大力倡导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大力倡导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要以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为重点。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制。社会主义法制体现人民的意志。要在全体人民中进行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教育,普及法律常识,增强民主法制观念,使人们懂得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懂得与自己工作和生活有关的法律,依法办事,依法律己,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要建立健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依法加强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管理,制裁和打击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规范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约束和制止不文明行为,形成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只是思想文教部门的任务,而且是各条战线和一切部门的任务,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爱国者的共同的长期任务。而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在精神文明建设

中负有重大责任：一是要加强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搞好党风；二是以模范行动和艰苦工作，组织和推动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我们党作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政党，党员干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做官当老爷，以权谋私，凌驾于人民之上作威作福，成为精神文明建设中一个影响特别重大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他说：“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他强调指出：“搞精神文明，关键是要以身作则。”

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必须建立起党委统一领导、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各方面分工负责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如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要努力探索规律，研究政策。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脚踏实地建设，就一定能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同时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十二、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政治保证的理论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不断发展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

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立国的根本方向。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我国近百年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所证明了的真理。只有进行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人民革命才能够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把黑暗的中国变成光明的中国。新中国建立后,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够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使中国由一个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变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和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同样,今后只有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够在我国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比较低的情况下,使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使国家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尽管社会主义自诞生以来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今后的路也不可能是笔直而平坦的,但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是,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如果违背了这个规律,中国的现代化就不能实现。

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立国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一方面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另一方面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党和政府依靠人民群众,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集中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同心同德地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权利不受侵犯,为了保证国家的建设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国际环境,维护国家独立统一,必须坚持对敌人实行专政。

共产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党的执政地位不是自封的,是历史形成的,是人民的选择。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一个封建国家逐步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谁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这个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谁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从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即,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经过28年浴血奋战,领导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的执政党,这是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建国46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党在工作指导上曾出现过偏差和失误,包括“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失误;目前,党内也还存在某些腐败现象。但是,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以对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毫不掩饰和坚决纠正工作中的失误,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在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仍然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这是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在经济文化落后且发展极不平衡的基础上起步的,是在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进行的,只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并制定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只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富有革命创造精神,密切联系群众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战胜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种种干扰破坏,经得起胜利和挫折、顺境和逆境的严峻考验,把实现“四化”的美好理想变成光辉现实。

也是因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效地调动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同心同德,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才能正确处理国内各种复杂矛盾,保持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还因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只有真正代表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人类社会发展方向、政治上成熟的党,才能在当今世界处于新旧格局交替的动荡时期,沉着应付,审时度势,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

权政治,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这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到。

马克思主义是在吸收了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科学理论,它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它科学地阐明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在揭示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上,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者的历史使命,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它科学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特征及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论证了无产阶级可能在帝国主义战线最薄弱的地方冲破,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内获得胜利。在列宁主义指导下,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马克思主义是深深植根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

果，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完成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在当代中国，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对我党长期以来积累的经验所作出的科学概括。早在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议上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政治概念。他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四项基本原则提出后，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并被载入党章和宪法，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和根本准则。1982年9月，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在现阶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全党团结统一的政治基础。同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把四项基本原则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十年以后，十四大党章又重申了这四项基本原则，并强调指出，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它体现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邓小平指出：“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证。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基，没有方向

四项基本原则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主要起着以下三

方面的政治保证作用：

第一，保证有一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的的改革开放，这种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完善，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

第二，保证有一个团结稳定的环境。首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的思想基础。其次，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政局稳定的保证。中国是一个有 12 亿人口、56 个民族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再次，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有力打击各种破坏活动，保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常秩序。对于破坏社会秩序的人主要是教育，但教育不是万能的，教育无效的就要实行专政。“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而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

第三，保证有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容，又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方针、政策以及

各项措施,都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制定和执行的;我们制定和执行各项政策所遵循的根本方向,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我们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事业的前进,必须要有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武器来保障。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正确地制定和执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方针、政策,保证全党和全国人民意志和行动的统—。

这些年来,面对变化多端的国际风云和国内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我们之所以能够始终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就是因为—我们坚持发展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了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了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三)在我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改革开放,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这些丰富的生动的实践,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

邓小平指出:“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贯坚持的。”“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样才能够教育全国人民,全国青年,全国工人,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也才能够说服那些向今天的中国—求真理的人们。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也就是说,四项基本原则本身是不断发展、充满

活力的动态概念,而不是抽象僵化的教条。它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实践。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又不断给四项基本原则注入新的内容,使四项基本原则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已经不只是通过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来夺取、建立、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进一步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我们党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完善,也是一场新的革命,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方面,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民主机制的建设,绝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立法和监督等职能,更好地发挥人民代表的作用,为人民群众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创造条件;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中的作用;重视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运用法律手段打击各种破坏社会秩序的活动。努力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使国家的一切治理活动和社会生活都逐步地纳入法制的轨道;随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还要更好地发挥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宏观调控职能,等等。

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方面,主张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要求全党增强执政意识,巩固执政地位;强调党的领导是政治、思想、组织领导的有机统一。一方面,党按照新的历史任务的要求,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又在领导体制、领导方式、党的活动方式等方面进行改革,要求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领导和组织人民当家作主,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加强和改进党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制度、理论等方面的建设,使党员队伍素质、党组织的战斗力不断提高,同时坚决反对党内消极腐败现象,加强廉政建设。

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方面,最主要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支持群众大胆探索,总结群众实践经验,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同时逐步纠正了对社会主义的种种不科学的认识,使四项基本原则被赋予了很多新的时代内容,得到新的发展。

(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

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中国的历史明白地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别无选择。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危害极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他一再强调，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项长期的斗争。邓小平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教育的问题，同四个现代化建设将是平行的，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对于我们始终如一地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具有深远的意义。

（五）在四项基本原则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

四项基本原则是互为条件、互相贯通、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从不同方面构成了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整的政治保证。其中，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因为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预防和制止动乱,不能没有人民民主专政;维护政治稳定的社会治安,打击犯罪,惩治腐败,也不能没有人民民主专政。

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主张发生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在什么范围内发生的问题就在什么范围内解决。我们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敌对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还会不时地产生走到人民对立面上去的贪污腐败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显然不同于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

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保卫国家主权和安全,抵御外来的侵略和威胁,不能没有人民民主专政。

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而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的统治被震撼并发生动摇。当时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对年轻的苏维埃俄国纷纷实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的政策,支持、唆使白匪叛乱

及至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妄图以武力将其扼杀在摇篮中。这是两种制度的第一次较量，是社会主义诞生后与资本主义必然发生的尖锐对立和斗争。自此以后，两种制度的对立和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形式上不断有所变化，但从来没有停止过，有时还很激烈。70年代后，国际形势出现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两种制度从冷战共处变为和平共处。帝国主义国家就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扩大对外交流的机会，变换手法，大搞和平演变。80年代末，东欧剧变，苏联随后解体，资本主义暂时得手，社会主义受到重大挫折。今后，两种制度的对立与斗争无疑还将继续，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相反，必须保障他们正确而有效地工作。也就是说，人民民主专政只能加强，不能削弱。邓小平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说：“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发挥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政法部门等国家机器的作用，有效地保证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为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长期安定的环境，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是大得人心的事情。反之，如果人民民主专政软弱无力，对违法犯罪分子手软，屈服于外来压力，只能危害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危害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国家安全、政治稳定和社会治安得不到保证，就会断送我们的社

会主义事业。

（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这是治理中国的大道理，别的小道理都要服从这个大道理。

在当代中国，发展经济需要稳定。“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使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这是已经被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需要稳定。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目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极其艰巨的，我们必须聚精会神，全力以赴。

完善民主、健全法制需要稳定。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有领导、分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民主和法制是密不可分的，现在，我们举国上下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法制经济，它要求建立健全法制，即根据形势的发展，制订新的法律、修订现行的法律，加强执法力度，加强对立法、执法、司法的监督等等，显然，这必须在稳定的环境中才能进行。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精神文明建设搞得不好，一方面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培养合格人才,提供各种科学知识,介绍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各种科学信息;另一方面,通过理想、道德和纪律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可以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精神文明建设,一要努力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二要加强理想教育,尤其是加强对青年一代的理想教育;三是加强道德教育;与此同时,还要加强教育、科学和文化建设。要做好这些,需要国家政局的稳定,倘若人心惶惶,就什么也干不好。

总之,中国的事情必须在稳定的环境中才能做好,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社会稳定。正如十五大所指出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中国不允许乱。中国有过“文化大革命”内乱的惨痛教训,决不能让这样的悲剧重演。1989年的政治动乱,更使我们认识到,一切导致中国动乱的因素都要坚决排除,不能纵容。邓小平指出,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会出现真正内战的局面。“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因此,他谆谆教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要永远记住这个道理,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珍惜和维护稳定作为自己的责任。

十三、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战略的理论

良好的国际环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邓小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精辟地分析了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形势，阐发了争得较长时间和平环境进行国内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及其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国外交战略的基本理论，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掌握这一理论的丰富内容，对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搞好对外开放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社会主义与世界和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和平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和平是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客观需要。邓小平在有关论述中，把这两个方面的含义都深刻、准确地揭示出来了。他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

说和平反映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因为从根本上说，它同社会主义的目标相一致。社会主义要向共产主义迈进，这是

不容置疑的。而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就是没有剥削和压迫,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文明的程度很高,人类实现永久和平。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都是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的。历史表明,主张世界和平,维护世界和平,不但能够大大提高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形象,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而且对推动世界向健康、进步的方向前进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反之,社会主义的形象会遭到损害,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往往会受到阻碍。

从客观环境的角度看,和平也是社会主义发展所必需的。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我国,在经济上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因此,发展经济成为头等重要的任务。要把精力主要集中在发展经济上,就需要有安定的边界,友好的睦邻关系;需要同世界各国加强经济往来,互补互利,需要扩大开放,与世界经济接轨,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需要引进技术,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和人类社会创造的全部文明成果。所有这些,都要求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要求我们努力去争取这样一种环境。

要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坚决反对霸权主义。霸权主义就是一些国家凭借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国之上。事实表明,无论什么国家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其结果都不但不能给世界带来和平,反而只会引起矛盾,加剧国际局势的紧张状态。帝国主义国家搞霸权,常常招致人民的激烈反抗,搞得地区不宁、战争不断;而社会主义国家搞霸权,则往往导致社会主义名誉扫地。所以,我们党一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正如邓小平所说:“对这个问题,不仅我,还有中国其他领导人,包括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

总理都多次声明,中国最希望和平。”

(二)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

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作为立足点,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也就十分明确了。邓小平指出:“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概括邓小平的思想,可以说,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

实现这一目标,首要的是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就是由自己决定自己国家的事情,因此是和反对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维护我国的独立自主,才能始终保持国家在世界上的分量。独立自主要求我们,第一,要不信邪,不怕压,不怕威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把维护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些西方国家利用各种手段对我国施加压力,试图迫使我们放弃社会主义,走他们的道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宣布:“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这充分表现了我们党坚决维护国家独立自主的决心。第二,政策自主。即从国家利益出发来决定取舍,而不是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如邓小平所说:“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中国既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我们不参加任何集团,但同谁都可以交往,同谁都可以交朋友,平等互利而不损害他国的利益。第三,永远不称霸。这是中国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所要求的。我们是第三世界国家,和所有第三世

界国家有着共同的命运。因此,我们将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也仍然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欺负别人。)

实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就必须始终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在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邓小平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很好地说明了坚持五项原则的重要性。在这里面,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让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受“左”的思想的影响,总是以意识形态来确定国家间关系的远近亲疏,结果许多问题都没有处理好。事实证明,把我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或是别国把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我们,都是行不通的,只能使国家间的关系恶化。所以邓小平意味深长地强调:“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

(三)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争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的可能性,确定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都基于我们对当今世界时代特征的认识。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创造精神和高度的理论

勇气，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问题的论断。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命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第一个是，和平和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在这种估计中，较多地依据了理论的推断，较多地看到了超级大国的相互对峙，而较少地注意到维护和平、要求和平的因素。实际上，制约战争的力量和因素是广泛存在的，而且在不断发展，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真正支持战争的是不多的。尤其是，“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现在，两极对抗已经消失，世界向多极化发展，更加缩小了大战发生的可能性。相反，各国人民都越来越认识到，国家能不能在世界上立足，归根结底要取决于经济发展。这也正是各国纷纷进行改革、探索适应本国特点的发展经济的道路的原因。所以，邓小平得出结论：“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和平与发展命题的第二个基本含义是，和平与发展仍是摆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的、尚未解决的大问题。从和平的角度看，虽然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但由于世界由两极向多极化发展，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新的格局尚在形成之中，导致了各种新矛盾、新冲突的产生，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宗教纷争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突出出来，有的还直接演化为局部战争。因此，国际形势仍然是动荡不安的。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由各种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原因所造成，许多发展中国家

家不但未能得到发展,反而经济状况更加恶化,富国越富、穷国越穷的矛盾更加突出,国与国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所以,像邓小平指出的那样,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实际上,两大问题密切相关。发展问题不解决,和平问题的解决就会受到影响。这是因为,许多问题和冲突,往往是由经济不发展引起的,而经济要发展,又要求有和平的国际环境。此外,发展意味着各国独立自主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因而也意味着和平力量的增强。世界越发展,和平的力量就越大。

认清和平与发展这两个当代世界的大问题,我们外交政策的正确性就有了充分的保证。

(四)积极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在正确分析时代特征、明确目标的前提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就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负起应负的责任。邓小平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为我们规定了在国际领域中的基本任务。

建立国际新秩序,是针对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国际形势提出来的。我们所主张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就是要改变由一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局面,结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促进国家之间平等、友好的关系。我们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是要改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实际上不平等的经济关系,通过对话逐步建立起平等互利合作的关系,同时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因此,我们认为,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应当成为国际新秩序的基础。正如邓小平所说：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就不允许以霸权为手段来达到目的；既不能自以为是，强要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按西方发达国家的观念来评断是非，也不能要求它们都照搬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模式，更不能干涉别国内政，在别国制造动乱。某些西方国家倚仗自己的军事实力，动辄对别国进行武力威胁甚至诉诸武力；有的则在经济上用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方法来谋取自己的利益。事实证明，这些都无助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邓小平深刻地指出了：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利益，相互之间发生一些矛盾是免不了的。但是，只要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争端通过协商来和平解决，国际新秩序是能够建立的。中国一如既往地为此而努力。

（五）坚持处理党与党之间关系的四项原则

如何正确处理我们党与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不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而且是国际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党既有大量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深刻的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确定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四项原则。它已成为我们党发展同其他各国政党关系的依据，并且已被实践证明

是完全正确的原则。

在四项原则中,最重要的是独立自主的原则。这和在对外交往中首先要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是意义相同的。毫无疑问,发展同其他国家政党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因为,要搞现代化建设,要搞改革开放,就必须和其他国家打交道。这中间就包括了要和这些国家的党打交道。打交道的目的,就是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对本国发展有益的东西,在建设中少走弯路,同时也是为了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但是,发展关系不能丢掉独立自主的原则。丢了它,发展关系就失去了意义。我们党历史上在处理党际关系方面也有过不少失误。但是,在独立自主方面,我们则是始终坚持了原则的。这也正是我们党能够闯过许多风浪、经受住多次大的考验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我们党的经验,邓小平为独立自主原则概括了许多重要内容。例如,其一,独立自主必须是能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丧失主见、听别人的命令和指示行事,不照搬照抄别国党的现成经验和模式。在这个前提下,才谈得上对别国党经验的学习与借鉴。其二,独立自主就是党要本着对本国和本国人民负责的精神决定问题,处理事务,而不应是对某个外国党或国际中心负责。所谓“中心”,从苏联党的实践可以看到,往往会变成小党服从大党,变成苏共干涉其他党内部事务的借口。所以,邓小平明确表示,我们“不赞成有什么‘中心’”。其三,独立自主必须是正确看待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把二者统一、一致起来。既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又要立足于本国的发展。因为党在国际方面能否尽到责任,首先取决于能否把我们国内的事情搞好。这些内容,都使独立自主原则具体化

了。

完全平等的原则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国的政党，历史有长有短，力量有强有弱，有的已经执了政，有的则还处在非法状态。但是，作为政党，其地位在党际交往中是完全平等的。各国党之间不应当有领导党和被领导党的关系，不应当有什么“老子党”、“父子党”。遗憾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在各国共产党之间，恰恰是在这方面曾经出现了大量的问题。苏共在共产国际中，在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中，都力图以“老子党”自居，以国际共产党的最高发言人自居，强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千篇一律，强求各国党对它的服从。甚至在失去了共产国际、情报局这类组织形式后，苏共也仍然试图保持其优越地位，用自己的意志来约束别国党的行动。这样做的结果，使得一些党同苏共关系紧张，最后反目成仇，而另一些党则为迎合苏共而脱离本国群众，国家建设和党的建设都没有搞好。所以邓小平说：“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实践证明，良好的、正常的党际关系，离开完全平等的原则是不可能的。

各国党之间互相尊重，既是地位完全平等的体现，又是发展党际关系的前提。互相尊重最主要的是要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不要对别的党随意说三道四，批评指责。任何国家的事情都只能由那个国家的党和人民去判断，因为任何外国党对于别国的情况总是比较生疏的，总没有本国同志那样了解自己的问题。即使犯了错误，也要靠本国的同志去总结经验和改正，这才靠得住。别的党得出的经验，作出的选择，是它们在各自己的实践中总结、摸索出来的，是它们在自己的活动中运用智慧的结晶。对这些党的劳动成果持简单的否定态度，不但是

对别人劳动的不尊重,而且往往是自认为有评判别人的权力的心态的表露,是不足取的。所以邓小平再三强调:有一点最重要,就是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画脚。尊重别的党的经验,就是尊重它们独立自主作出的决策。我们尊重别人的独立自主,别人才会尊重我们的独立自主。从这个意义上说,互相尊重又是独立自主原则的延伸。

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也是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这条原则和前三条原则是紧密联系着的。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反过来,只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才能真正做到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在邓小平的论述中,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不但与前三条原则相辅相成,而且本身也包含大量的内容:它包括不允许别国党干涉我们党的内部事务,这实际上是维护党的独立自主的一个具体方面;包括我们党不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因为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这两个内容加起来,就是邓小平申明的:“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此外,这条原则还包括,我们反对通过党的关系去干涉对方国家的内政,像苏联在1969年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国家所做的那样;也反对利用党的双边关系去损害其他党和任何第三者。从这些丰富的内容可以看出,我们坚持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认真去做的。

四项原则全面、系统、准确地概括了处理我们党同世界其他政党、特别是工人阶级政党之间关系的基本要求,我们应当

牢牢把握它。

(六)我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指导方针

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出现危机,有的改旗易帜,放弃科学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往何处去,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邓小平总揽全局,高瞻远瞩,深刻阐明了对复杂国际形势的态度。他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他强调:“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决不当头——这十六个字,是当前形势下我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的指导方针。

冷静观察,说到底,就是要正确看待形势,正确认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挫折。在苏联、东欧相继演变或解体、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纷纷垮台的形势下,国内有些同志信心动摇,产生了悲观情绪,以为中国也难逃此厄运;有的则把问题看作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主张停止或放慢改革的步伐。这实际上说明我们的同志看问题不全面,不深刻,不辩证。邓小平以伟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洞察这些问题,深刻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他认为,世界上发生的变化,对我们并非

全是坏事,而是困难和机遇并存。他说:“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所以,邓小平强调:“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稳住阵脚,就是在冷静观察的基础上,站稳脚跟,摆正自己的位置。1989年“六四”风波以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确实给我们制造了许多麻烦,一会儿是制裁,一会儿是人权问题,针对此,邓小平坚决地指出:“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中国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这是看问题、做事的基点。事实表明,你越不怕,它们就越拿你没办法,制裁、威胁也就越不灵验;相反,你越示弱,它们就越看不起你,就越要打你的主意。相信中国自己的力量,不妄自菲薄,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取得胜利的。

沉着应付,是面对复杂国际形势确定我们对策的指导思想。它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要求:第一,在国际方面,既坚持不屈服于西方国家的压力,又不放过任何发展的机会。正像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第二,在国内事务方面,正确处理反和平演变与抓经济建设的关系。不能把反

和平演变和发展经济对立起来。要看到，苏联、东欧发生问题，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经济没搞上去，使社会主义失去了吸引力。所以，“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为此，邓小平强调：“综观全局，不管怎么变化，我们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这十年建设，不要耽搁。”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

决不当头，是对我们党过去几十年活动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深刻总结后得出的结论。中国历来不主张自己当头，也不希望有什么党什么国家来当我们的头。但是，由于各种纷繁的因素，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也当过反对“修正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党”的头。但事实表明，当这种头并不是明智的选择。不但因为卷入意识形态论争而耽误了我们许多宝贵的时间，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且由于没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错过了科技革命的浪潮和许多发展机会，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因此，我们尤其需要把“决不当头”作为重要的指导方针。邓小平说得好：“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不当头就是用实际行动来表明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邓小平深刻表达了这一点：“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十六字方针”指导着我们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实践，具有并且已经显示出了重大的战略意义。

十四、一个 国家,两种 制度

——关于祖国统一的理论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简称“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一)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只有实行“一国两制”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

国家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反对分裂,坚持统一,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国家的统一作为自己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邓小平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统一问题,“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他还指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来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是在新条件下对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毛泽东、周

周恩来就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原则，为了结束台湾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状态，主张“和为贵，爱国一家”，“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向台湾当局多次“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提出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台湾必须回归祖国”的原则立场，认为只要国家主权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台湾省的内部事宜，由国民党台湾当局蒋介石安排，最好的办法是由国共双方来谈如何统一，共同把中国建设好。周恩来代表我国政府还多次申明“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但香港是自由港，“不应该社会主义化”，“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它可以作为我国同外国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同时提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等正确主张。

邓小平在1984年7月，同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这个构想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一国两制”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中国有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面都能接受。什么东西能接受？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应该是能接受的。我们提出实行“一国两制”，就是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但是，根据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也不能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所以，提出“一国两制”的方式，是完全尊重台湾的历史和现实、尊重香港的

历史和实际情况的，是符合和平统一祖国的根本利益的。

（二）“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

实行“一国两制”，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是“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它包括一个前提，五个基本点：

一个前提，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允许两种制度存在。邓小平说，“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这就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一国两制”的因果关系讲清楚了，表现出政治上的自信和勇气。这种自信和勇气是建筑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的。人民拥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在中国制定和实行“一国两制”的政策。所以，前提是“一个中国”，而不是“两个中国”，“一国”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不是“多国”，不允许在中国搞什么国中之国。这就是在国际上代表中国主权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五个基本点，实际上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问题，具体地说来，它包括：

——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里，整个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是这个统一国家的组成部分，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统一的国家内部，实行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长期并存，和平共处，互相竞赛，互相支援，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振兴。

——由这个统一国家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行使国家的权力；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则按照宪法规定设立特别行政区行使地方政府的权力。

——在祖国统一后，特别行政区内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特别行政区享有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所没有的高度自治权，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的所有权、合法的继承权和外国的投资都受法律保护。台湾特别行政区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宪法、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有关法律保障“一国两制”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并按照法律程序调整各方面的矛盾，保证大陆地区和特别行政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

（三）“一国两制”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构想

“一国两制”的精髓是实事求是。邓小平说：“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创造性的构想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根据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在本世纪末要达到小康水平，下个世纪中叶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需要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也需要一个繁荣稳定的台湾和澳门。因此，“中国可以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实行两种制度，这就是制定我们国家政策的一个想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

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香港、澳门和台湾保持原有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有利于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绝大多数人口绝大多数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可以容许在比较小的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没有这个前提，资本主义就要吃掉社会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一国两制”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了国内新的和平环境，创造了新的外部条件，对中国和世界进步和发展都有深远的意义。如果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可能提出“一国两制”，即使提出来了，也是难以付诸实践的。

邓小平坚持运用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则，从中国实际出发，依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逐步形成“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有一个逐渐形成和完备的过程。

在中美建交谈判的过程中，由解决台湾问题缘起，初步提出“一国两制”的思想。1978年10月8日，邓小平会见日本文艺评论家江藤淳时说：“如果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在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我们正视美国、日本在台湾有大量的投资问题。1978年11月14日，邓小平对缅甸总统吴奈温说：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1978年11月27日，邓小平同美国作家罗伯特·诺瓦克的谈话，说明和平统一实现以后，台湾可以保持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1978年12月中旬，邓小平提出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台湾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和外国投资不变。这是根据历史经验和台湾现实提出的正确主张。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指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台湾回归祖国怀抱的前景已进一步摆在我们面前。”

1979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申明“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举行的讨论《告台湾同胞书》的座谈会上说，今年这个元旦，是个不平凡的日子，不同于过去的元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第二，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这是由于在国内和国际的工作中取得重大成就的结果。《告台湾同胞书》正式提出两岸恢复通商、通邮、通航，和进行经济、科学、文化、体育交流，这些建议有助于促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符合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1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记者时指出：我们多次声明，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完全是中国内政。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实现了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我们当然力求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但究竟可不可能，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承担这么一个义务：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反而会妨碍和平解决台湾这个良好的愿望。1月30日，邓小平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说，再次申明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同时强调“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

的现实和现行制度,我们一方面尊重台湾的现实,另一方面一定要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尊重台湾现实的情况下,我们要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速度”。在美中国人民友好协会和全美华人协会举行的招待会上,邓小平又说:统一祖国是全体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共同愿望。我们关怀台湾同胞,寄希望于台湾广大同胞。我们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1979年3月,邓小平对香港总督麦理浩说明为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我们始终考虑到台湾的特殊地位,不改变那里的社会制度,不影响那里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拥有广泛的自治权,拥有自卫武装力量。当然不能有两个中国,也不能有一个半中国。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为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对台湾,我们条件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台湾的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与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民间交往照旧”。台湾与祖国统一后,外国投资也不受任何影响,我们尊重投资者的利益。强调“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自己的自卫力量,军事力量,条件只有一条,那就是,台湾要作为中国不可分的一部分。它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充分的自治权。”上述情况表明,“一国两制”的提出是从台湾回归祖国问题开始的。其基本思想在邓小平的谈话中已经清楚的表达了。

以叶剑英委员长发表和平统一祖国的九条方针政策为标志,经过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形成“一国两制”的科学概括和阐述。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九条方针政策:(1)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

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2)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3)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4)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5)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6)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7)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来去自由。(8)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9)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我们热诚欢迎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邓小平在1982年1月曾对海外友人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制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他那个制度。1984年12月19日,他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又说:“1981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发表的九条声明,虽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两年前香港问题提出来了,我们就提出‘一国两制’”。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明文规定“国家在必要的时候得以设立特别行政区”,为“一国两制”的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证。

邓小平在1982年9月24日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表明中国政府对解决香港问题的原则,指出我们对香港问

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主权问题;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中英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邓小平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谈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如果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在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此后,经过两年的中英谈判,用“一国两制”的战略方针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的重大原则就定下来了。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阐明“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不现实。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可

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对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说，祖国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邓小平同布热津斯基的谈话使用“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提法，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概括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0月22日邓小平又更简明地作出“一国两制”的概括，这都反映了邓小平从中国自己的实际提出问题并把它延伸到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问题的战略思考。

邓小平系统阐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战略构想，经过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和公布，“一国两制”的构想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完备化、法制化。

（四）“一国两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

邓小平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

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这就是说，国家的统一，民族的振兴，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而要完成这个光荣的历史使命最切合实际的方式就是：“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因为它符合中国的国情，充分体现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它符合中华民族的民心民意，能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所接受；它符合当代国际社会和平发展的历史趋势，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问题的一个范例；它也是运用和平共处原则处理中国内政问题的合情合理的方式。我们之所以能够制定“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一是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有人民的拥护。因此中国共产党有这种胆略和勇气制定“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这个胆略是要有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没有一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来自人民的拥护，人民拥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

正因为如此，讲“一国两制”就必须讲两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否则怎么能说是“两制”呢？那就变成“一制”了。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希望中国大陆变成资本主义，叫做“全盘西化”。在这个问题上，思想不能片面。不懂得讲两个方面，“一国两制”几十年不变就行不通了。“一国两制”要长期不变，就要保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是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忽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或者想用社会主义统一港澳台，都是一种片面性，都不能长期实行“一国两制”。

（五）用“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香港、澳门问题

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是历史上殖民主义侵略遗留下来的问题，是分别属于中国和英国之间、中国和葡萄牙之间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根据“一国两制”的指导方针进行的。

1982年至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在“一国两制”的思想指导下获得巨大的成功，中英两国政府达成协议，签发了联合声明，这个文件具有国际法性质的法律效力，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映，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对此，邓小平说：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再过十三年，再过五十年，会更加证明‘一国两制’是行得通的”。接着，组织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邓小平希望这个基本法真正体现“一国两制”的构想，使它能够行得通，能够成功。

1986年至1987年，中葡两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解决澳门问题的谈判也获得了成功，双方签署了联合声明，这是向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迈出的又一个重要步骤。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别于1990年4月和1993年3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邓小平十分重视这些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他在1987年就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说：“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范例。”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完成后，他在1990年2

月指出，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主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香港在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后实行“港人治港”。邓小平强调“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胜利地恢复了对香港主权的行使。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巨大成功，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得到切实贯彻执行，保持了繁荣稳定的局面。”事实必将证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同胞一定能够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治理好香港。

澳门将于1999年回到祖国怀抱，这是中华民族的又一盛事。澳门回归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积极有序地进行，澳门完全可以实现平稳过渡、顺利交接，并保持长期发展和稳定。

（六）用“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国内战争遗留下来的，属于中国的内政，不容许外国干涉。

国家必须统一，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坚持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一国两府”、“台湾独立”，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台湾独立的企图和行动。这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我们将继续促进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推动两岸人民的往

来和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特别是大力发展两岸经济合作，共同振兴民族经济。我们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愿意同中国国民党尽早接触，以便创造条件，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在商谈中，可以吸收两岸其他政党、团体和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就两岸正式谈判的方式问题同台湾方面进行讨论，找到双方都认为合适的办法。希望台湾当局顺应民心，消除阻挠祖国统一的人为障碍，使两岸关系有一个新的发展。

但在解决台湾问题上，我们也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它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的。尽一切力量去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我们的愿望。不放弃使用武力，有利于促进和平解决。只要台湾当局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消除阻挠祖国统一的人为障碍，通过接触和谈判，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终归可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

1995年1月底，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根据邓小平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若干问题，提出了重要看法和主张。它的主要点包括：

——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

——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

——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

——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

——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

——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

这些主张和看法，对于推动祖国统一大业，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其结果将如同彭真所说：“一个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的中国，一个由于实现统一而加速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将在世界上赢得更多的尊重、产生更大的影响。”

（七）“一国两制”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在国家学说史上，“一国两制”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可以有不同的社会制度，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国家包含不同的制度，马克思、列宁没有讲过，在世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中是全新的东西。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一国两制”容许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并存于“一国之中。使“两制”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下，这不仅没有改变我国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为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而且国家赋予保证大陆地区和港澳台地区的和平建设的职能，发挥人民国家的“调停人”作用，缓和“两制”的矛盾冲突，调节“两制”之间的关系，保证“两制”能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有关法律和平共处，共同保持社会稳定、繁荣和发展。同时，在国家结构形式上由于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也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具有独特的创造性。

邓小平说：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这是独立自主处理中国内政问题的新路子，比如台湾问题，要实现与大陆和平统一，需要有个适当方式，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包括台湾在内，中国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不是哪个党哪个派，而是整个民族的愿望。台湾不回归祖国，不实现同大陆的统—，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别人拿去。现在国际上有好多人都想在台湾问题上作文章。一旦台湾和大陆统—了，现行制度一切都不变，形势就稳定了。这些，都是具有独创性的科学理论。

“一国两制”的构想，体现了坚持祖国统—、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一国两制”的构想，体现了照顾历史实际和现实可能的灵活性。用社会主义去统—香港、澳门、台湾，难以为有关各方所接受。只有承认“两制”的现实，充分照顾到香港、澳门、台湾的利益，才能找到有关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方案，才能保证这些地区在祖国和平统—后的繁荣和稳定。所以，“一国两制”是行得通的。

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然而，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国际争端有一些热点、爆发点。如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发性的问题。因为台湾历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而美国有一股势力继承“杜勒斯主义”，把台湾当作美国的“航空母舰”和势力范围，如果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大陆和台湾的和平统—，这个热点也就消

失了。香港问题则有中英关系问题。澳门问题又有中葡关系问题。中日关系有钓鱼岛问题。南沙群岛还涉及中、越、菲、马之间的关系问题。邓小平站在国际战略的高度,认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解决问题的出路。不用战争手段,用和平方式,采取“一国两制”或“共同开发”这类方式解决争端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这样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不利于世界和平和稳定。所以,“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一国两制”的构想具有国际意义,就是可以引用“一国两制”所包容的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精神,尊重历史和现实,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建设性地解决一些国际性的、地区性的难题和冲突,促进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的解决。

十五、我们的事业要依靠广大人民来完成

——关于社会主义事业依靠力量的理论

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归根到底是邓小平根据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总结、概括了群众的实践和创造而形成的。要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需要依靠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离开了群众的实践,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

(一)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

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生机勃勃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由人民群众创造并推向前进的。邓小平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这种历史作用,把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赢得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首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映了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与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一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利益是党的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

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是以人民群众的最根本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邓小平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他认为，不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由此出发，他把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与繁荣，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各项工作的重要标准，作为判断社会主义搞得好不不好的标准之一。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他把在经济上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政治上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包括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在内的各项公民权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目标，作为党的工作的奋斗目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其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是党在长期斗争中坚持的根本的工作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邓小平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就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邓小平说：“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他把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为制定各项政策必须坚持的原则，指出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他要求各级领导在做决策时，第一条就是要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事。邓小平不仅要求全党这样做，而且还身体力行。他十分重视群众在实

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把群众的经验、创造加以理论概括,上升为指导全国工作的方针。他曾以农村改革为例说明这个问题。他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在其他领域的改革也是如此。因而邓小平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这表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过程中形成的。而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任务,也要依靠党的群众路线。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与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事,只有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才有可能获得成功。而群众的广泛参与又有赖于能否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邓小平认为,这些年来搞改革的一条经验,就是要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积极性的方法有二:其一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其二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权力下放,使农民真正享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使工人、知识分子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群众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能真正贯彻下去,坚持下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真正有希望。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

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础、主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依靠力量。建

国 50 年来,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已发生了重大的根本性的变化。工人阶级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在国家宪法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工人阶级的队伍空前壮大,素质明显提高。广大农民已不再是自然经济束缚下的小生产者,而是受到几十年社会主义教育,有过 20 多年集体化实践的新型农民。工人与农民的联盟是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联盟,这个联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基础。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而工农联盟更为扩大、发展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主力军。工人阶级为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我国社会总产值和国家财政收入的 70% 以上都是工人阶级创造的。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搞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农民的支持就没有真正的现代化。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殊的作用。能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兴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没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此外,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无产阶级政权性质,也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知识分子。

(三)工人阶级是建设和改革最基本的动力

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最具有组织性、纪律性,最具有自我牺牲精神,是一个革命最坚决最彻底,

特别能战斗的阶级。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是整个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工人阶级积极投入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去,参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付出巨大劳动。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必须紧紧依靠自己的阶级基础。党在制定方针政策时,要体现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意志和要求,照顾到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支持和保证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维护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改革中的重大举措,都要向工人群众说明,以取得工人阶级的拥护和支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脱离工人群众,更不能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

工人阶级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贡献的同时,自身队伍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工人阶级的数量大大增长。建国初期,我国职工总数大约为 800 万人,在当时全国人口总数中占 1.8%。到 80 年代末期,我国职工人数已达 1.374 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12.6%,占社会劳动力总人数的 26%。工人队伍的文化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50 年代后期,工人队伍的整体文化水平较低,小学毕业以下的职工占职工总数的 79.7%,其中约有 20% 是文盲。随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随着工人队伍成员的不断更新,到 80 年代后期,职工中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占 42.86%,初中毕业的占 43.02%,二者相加占了职工队伍的绝大多数。小学毕业及其以下的仅占 14.16%。此外,企业生产劳动第一线的科学技术

力量也大大增强了。全民所有制企业中每万名职工中的科技人员,80年代比50年代增加了2.5倍。进入90年代,工人阶级队伍的科技文化素质又有了新的提高。企业员工科技文化素质的高低已经成为决定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工人阶级队伍的这种发展变化,既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带来的成果,又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工人阶级的构成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不仅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除了传统的全民所有制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职工以外,乡镇企业的职工,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的职工也成为工人队伍中的一部分。在全国职工总数中,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约占80.62%,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基本队伍。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职工约占18.95%,这部分人数和比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还将继续增加、提高。乡镇企业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改革中崛起的一支新军。在80年代末,全国乡镇企业职工人数已达9545万。当然,许多乡镇企业职工还处于从农民阶级向工人阶级的转化过程中。80年代中期,真正同农业生产脱钩,完全转化为工人的大约有1000多万人。在私营企业工作的职工,据80年代末统计达360多万人,这部分职工连同外商投资企业的职工,在全国职工总数中还不到0.5%。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由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因此各种所有制企业职工的人数、比例不是稳定不变的,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工人数量会有一定增长。尽管职工的数量、构成有许多新的变化,但他们都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推动力量。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出现,职工的就业方式、劳动方式都有一些新的变化,如打破铁饭碗,实行合同制等等。但这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和经济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和主导作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以及公有产权占主导地位的企业职工既是国家的主人,也是企业的主人,应使他们充分享有依法行使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邓小平十分重视职工的这种权利,强调指出:“所有的企业必须毫无例外地实行民主管理,使集中领导和民主管理结合起来。”“企业的重大问题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讨论。企业的领导干部要在大会上听取职工的意见,接受职工的批评和监督。对某些严重失职或作风恶劣的领导人员和管理人员,大会有权向上级建议给以处分或撤换。”他认为,这是调动工人群众积极性的重要途径之一。非公有制经济的企业职工,其政治地位依然是国家的主人,是领导阶级中的一部分。广大工人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工人,顾全大局,艰苦奋斗,在改革开放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命脉,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前途。这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全国企业总数中虽然只占1.45%,但上缴给国家的利税却占国家总收入的绝大部分。由此可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工人创造了最大部分的社会财富,是对国民经济起决定作用的主力军。在当前深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形势下,党和国家必须充分照顾到工人阶级的利益,维护工人阶级的国家主人翁地位。同时,工人阶级也要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管理、技术、文化水平”,“要发扬艰苦奋斗、大公无私、严守纪律、服从调动、爱厂如家的光荣传统”,在改革开放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四）农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人数最多的依靠力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从农村着手。农民在改革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主动性、创造性，创造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实现了由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由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多种经营的综合型经济的转变。广大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提高。乡镇企业的出现，小城镇的兴建，多种经营及种植业、养殖业商品率的提高，则促使农民阶级内部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十几年来，农村已有大约1亿多劳动力转移到农村第二、三产业中去。农民内部结构的变化，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村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改革开放的政策是正确的，“农村改革的经验使我们相信城市改革能够搞好”，农村经济改革对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有着极其重要、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十分重视农民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他高度评价农民在改革中迸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认为，由于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完全下放给农民，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有了这种积极性，才能有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等新事物的出现。邓小平在1987年6月会见外宾时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这个政策取得了这样好的效果，使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是我个人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同志也没有预料到，是突然冒出这

样一个效果。”这是邓小平对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热情赞颂、充分肯定。

邓小平之所以如此重视农村经济改革,把农村经济改革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主要是因为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大局。他指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为着发展全社会的生产力,为着改变农民低水平的生活状况,必须首先在农村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基于这种考虑,邓小平时刻关注着农村改革的发展,及时总结改革中涌现的新鲜经验并加以推广,及时指出改革下一步发展的目标。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乡镇企业很重要,要发展,要提高。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这里,邓小平提出了农村改革的方向性的问题,提出了农业的重要性问题。为了真正实现这两个飞跃,搞好农村经济,巩固农村改革的成果,就必须像邓小平那样重视农业、农民问题,保护农民的积极性,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切实保护他们的物质利益,不以任何名义增加农民负担,不折不扣地落实应该给予农民的各项优惠措施,使农民真正得到实惠。要帮助农民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学习文化,转变传统的小农意识,提高农民自身的素质,使他们成为有文化、有

本领的新型农民。同时,也要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和引导工作,提高他的思想道德水平,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上述工作真正落实到实处,农民才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基本力量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知识较多的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基本力量。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知识分子在发展生产力、推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我们党曾走过一段弯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知识分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当成教育和改造的对象而不是依靠的对象;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划入资产阶级阵营,被当作监督、改造甚至专政的对象。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宣布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此,歧视和否定知识分子的倾向才真正开始得到纠正。邓小平认为,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大发展生产力的“两个前提”。这是因为经济建设必须首先依靠科技的进步,而科学技术的每一个进步都是与知识分子的努力分不开的。二是因为作为经济发展基础性因素的教育事业乃至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与知识分子分不开的。因此,依靠知识分子,推进科技进步,已成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关键性因素和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从这个角度出发,邓小平强调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提出打破常规,破格选拔、培养杰出的

人才。他把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作为科学教育战线的重要任务。为着完成这个任务,党和国家要努力创造更加有利于知识分子施展聪明才智的良好环境,下决心采取重大政策和措施,积极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对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给予重奖,并形成规范化的奖励制度。当然,知识分子也要继续努力,在政治上业务上都要不断求得新的进步。对于知识分子的缺点错误,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通过教育来帮助他们。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各族人民的团结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是一项基本的国情。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有各民族人民的支持和努力。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中国各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各族人民利益的根本所在,因而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各族人民将更加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

在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维护民族团结必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关于民族自主的原则,从实际情况出发,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基本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首先,从历史上看,中国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既照顾到各民族的不同特点,又有利于国家统一,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各族人民的利益。其

次，中国民族的分布，呈现出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基本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分别建立各民族的国家是不适宜的。只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不同民族聚居区建立起与其经济、政治条件相称的不同规模的自治地方，才能适应民族分布的特点。其三，中国资源分布和经济发展不平衡。沿海、内地汉族地区人口众多，政治经济比较发达，科学技术力量雄厚。而占全国总面积60%多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但资源十分丰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各民族地区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互相支援，互相帮助，互通有无，符合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四，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领导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各民族人民有着共同的革命斗争历史。在这种斗争中各民族中都涌现出一大批革命骨干，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准备了干部，创造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组织上的条件。建国后的历史也表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各民族人民实现自治的愿望。各民族人民享有包括立法权、变通执行权、培养干部权、语言文字权、经济权、外贸权、财政权、交流权等在内的各项自治权。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能够促进各民族的团结。

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最根本的途径还是要创造条件，帮助民族地区发展生产力，使各民族人民生活富裕起来。只有这件事办好了，才能巩固民族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上去，自治就是空的。因此，邓小平强调：“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只有真正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把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搞上去，才能真正形成各民族的事实上的平等关系。因此可以说，邓小平确立的这一政策是引导各民族走向共同繁荣的政

策。

（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依靠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法宝，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统一战线已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爱国统一战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依靠力量。

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具有空前的广泛性。这种广泛性来源于国内阶级状况已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建国几十年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三部分劳动者成为中国社会的三支基本力量。他们是爱国统一战线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民主党派原来的社会基础，即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复存在，其构成人员已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或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民主党派原来联系的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民主党派并不会消失，而是成了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此外，台湾、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对外交流的发展，与我们的联系交往越来越多，一些原来与我对立的人，也转到了人民的方面，成为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如此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利条件。

坚持、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必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使各党派共同为开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

新局面而奋斗。坚持、发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还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人民政协是巩固和扩大革命的祖国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是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重要组织,也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人民政协在广泛联系各界人士,实行民主协商和监督,开展国际友好往来,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坚持、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还需要做好民族工作、宗教界的工作、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工作,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以及其他一切热爱祖国的港澳台同胞和国外侨胞的工作。

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是建筑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相通的,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爱国主义是一面团结各族人民、各阶层人民的旗帜,是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强大动力。只要有利于建设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不论哪一阶级、阶层、党派、团体,不论哪一个人,我们都要团结。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是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力量。

十六、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和国防建设的理论

新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和国防建设的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的纲领,是军队和国防实际工作的指南。它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形成了新时期极为重要的建军思想。

(一)转变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军队和国防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基于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分析,邓小平对当今时代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判断是:大仗一时打不起来。这一科学判断改变了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是迫在眉睫的判断。据此,我国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了战略性转变,即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全面转入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

邓小平指出,军队建设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不断增强国防实力,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同时,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自觉地在这个大局下行动,积极支持和参与国

家经济建设。

1985年，在邓小平领导下，我军裁减员额100万。这一重大的战略决策，是实现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重大举措，是反对军备竞赛，维护世界和平的实际行动。

（二）实施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军事战略是指导武装力量建设和运用武装力量的基本依据。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去侵略人家。因此，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处理问题。我们力求避免和制止战争，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我国的军队和国防建设与采取战略进攻方针的霸权主义国家不同，霸权主义国家发展军事力量是为其侵略扩张政策服务的。他们着重发展进攻性武器，大力制造远洋作战需要的武器及其运载工具。虽然，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国家必须具有用军事手段捍卫主权和安全和能力。但是，我们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是从抵御外来侵略，保卫我国安全的需要出发。比如，在武器装备问题上，我们以发展常规武器为主，发展核武器只是为了打破核垄断，用于防御。总之，我们加强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完全是为了防御。

人民战争始终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我们过去能够用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的敌人，就是因为我们进行的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支援，打的是人民战争。今后我们仍然要坚持人民战争。要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我国军事科学，认真研究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探索人民战争的新规律、新战法。

（三）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是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在新时期,我军不仅肩负着保卫国家领土、领空、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全的神圣使命,而且担负着积极支持、参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并为其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的神圣使命,为了更好地完成保卫祖国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邓小平明确指出,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军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总目标。就是说,我们的军队必须是党领导下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崇高的理想和严格的纪律,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能够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革命军队;必须是用优良武器装备武装起来,掌握先进军事科学理论和军事技术,具有现代条件下自卫作战能力和现代化军队;必须是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训练的诸军兵种密切协同动作的正规化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三个方面互相联系,互相促进,构成了新时期我军建设的鲜明特色。据此,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对部队建设提出了“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

(四)必须把革命化建设放在首位

新时期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必须把革命化建设放在第一位,坚持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革命化体现了我军现代化的性质,是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根本标志。邓小平指出:“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

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具体体现在：

思想政治建设是革命化建设的核心。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军形成了一整套思想政治建设工作的优良传统，包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部队；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贯彻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原则；发扬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培养部队的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等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军队，绝对不能忘记这些传统，而是要结合新时期的实际，丰富其内容，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这是搞好军事训练、后勤保障以至整个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必须把它摆在全军各项建设的首位。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的根本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党和军队的问题上，过去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今天仍然是这样。军队要听党的话，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地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而奋斗。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加强军队党组织建设，发挥集体领导作用，必须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要求加强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革命军人。

军队必须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邓小平指出，对我们军队来说，有坚定的信念，现在仍然是一个建军的原则。我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

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仅是立国治国之本，也是立军治军之本。新时期对部队要深入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坚决维护、认真贯彻、模范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保持老红军本色。从井冈山时代起，毛泽东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概括地说，这种作风就是艰苦奋斗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的作风。这是一代人用鲜血换来的克敌制胜的无价之宝。在和平建设时期，邓小平要求军队的高级干部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搞好传帮带，把老红军的优良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以此做到毛泽东同志说的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加强军队内部团结，发扬三大民主传统。邓小平非常重视军队内部的团结，把它看成是我军力量的深厚源泉，是人民军队的一个根本标志。因此，强调在部队要搞“五湖四海”，保证官兵之间、上下之间、同志之间、各部队之间互相尊重，团结一致，反对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强调发扬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和尊干爱兵的好传统，改善和密切团结友爱的官兵关系，以调动官兵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为进行军队现代化建设，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创造条件。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不断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在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是人民军队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我军的真正优势。邓小平反复强调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思想,指出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都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肩负保卫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重任的军队更要重视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党和国家的任务、军队的任务规定着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新时期我军的政治工作,必须服务于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性质,保证军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军队内部的团结和军政军民团结,保证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动员和团结全体官兵把我军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这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要依据这一思想,针对新时期我军政治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充实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探索行之有效的方法。要教育广大官兵拒腐蚀、永不沾,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走在全社会的前列。

(五)必须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

实现国防现代化,是四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建设一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是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

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这是新时期我军面临的主要矛盾,即现代化水平与现代战争需要不相适应的问题决定的,是现代战争对我军建设提出的必然要求。现代战争显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对军队的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看到,目前我军的现代化程度不高,主要包括现代科学文化水平不高,现代军事科学知识和组织指挥能力不高,武器装备比较

落后,这是我军建设的薄弱环节,决定着新时期军队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现代化水平与现代战争的需要还不相适应。为此,邓小平强调,军队建设要解决现代化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难以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军队的战斗力就没有物质基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以史为鉴。过去一个长时期内,由于林彪搞“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那一套,使我军建设一度偏离了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给我军的建设造成很大损失。今天现代战争的要求越来越高,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就更加迫切、繁重,因此,军队和国防建设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

一般地说,军队现代化主要是四个方面:

一是,武器装备现代化。这是军队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主要标志。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和广泛应用,引起了武器装备的巨大变革,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成为国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防现代化又离不开农业、工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它归根到底是以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因此,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国力许可的情况下,我们要努力改善和发展军队的武器装备,并根据我们的国情、国力制定装备发展的战略要求和目标。要从抵御外来侵略,保卫我国安全的需要出发,有重点有计划地发展武器装备,坚持少而精、质量第一的方针,搞真正顶用的东西。同时,要努力发展国防科研事业,使国防科研走在国防工业生产的前面,积极研制新式武器装备,不搞科研,我们就根本不可能有现代化。在武器装备现代化进程中,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同时注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先进装备和先进的管理方法。要走出一条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新路子。

二是,能使用现代武器的人。这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所在。搞现代化建设,决定性的因素,是培养和造就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掌握现代军事科学知识和技能的人。没有这样的人,即使有了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也算不上一支真正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因此,邓小平强调,在和平时期,不打仗的条件下,军队主要靠教育训练提高战斗力,要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地位。教育要以军事训练为重点,军事训练是部队经常性的中心工作,“仗可能多年不打,兵不可一日不练”。

在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合同作战,武器装备技术性强,组织指挥复杂,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和梗阻,都可能影响全局。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天上地面、水上水下、前方后方,同时进行,这就要求军队的教育训练,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加强现代高科技知识的学习,注重诸军兵种合成作战训练,特别是要训练干部学会指挥现代战争。

强将手下无弱兵。部队训练成绩的好坏,战场作战效果如何,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干部教育训练的水平。现代战争对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邓小平很重视院校教育,强调要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问题。要通过各级各类军事院校,培养掌握现代战争指挥艺术的优秀指挥员和各类专家,并采取多种措施、多种方式加强部队干部的在职训练,还要结合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大力培养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军地两用人才。要贯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导方针,搞好院校教育改革,提高院校教育的水平,充分发挥院校集体干部部的作用,为部队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三是,加强军队后勤现代化建设。过去我们是小米加步

枪,对后勤的依赖较少。现代条件下作战,无论是军需给养、武器弹药、装备器材,都要靠强大的后方供应。随着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发展,对后勤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后勤工作的任务越来越重,后勤工作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把后勤工作管好,需要有适应新时代的一系列制度和解决办法。要精打细算,开源节流,同破坏财务制度、铺张浪费的现象作斗争,把钱真正用到提高战斗力上。

四是,把人组织起来,把人和武器结合起来,这就要有科学的编制体制。邓小平一贯主张把军队搞精干。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消肿”主要是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还有,国家支付的军费相当大,不利于我们的国家建设;军队人员过多,也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总之,搞四个现代化也好,把军队搞精干、提高战斗力也好,都需要“消肿”。

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体制改革是我国上层建筑领域的一次深刻的革命。军队的体制改革是全国党、政、军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军队改革体制,就是要实行精兵政策,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把重点放在改善武器装备和提高人的素质上,并实行科学的编组,使人和武器装备更好地结合起来。军队通过改革体制,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由于压缩军队规模,可以腾出钱来研制和发展现代化武器、技术装备,使我军武器逐步得到改善;我军将进一步向合成军方向发展;各级指挥更加灵便,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全军干部队伍的素质会进一步提高;官兵比例将趋向合理;各级领导班子更加精干;领导机关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将得到改进,工作效率会有大的提高;军队院校的体制将进一步适应军队建设的需要,有利

于培养大批军队现代化建设人才；预备役建设将得到加强，使我军有雄厚的后备力量，能应付各种突发事件。

我军在邓小平领导下，80年代裁减员额100万。经过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在精兵、合成、高效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党的十五大作出决策：我国将在今后3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

（六）必须进行正规化建设

正规化建设是我军建设的重要方面，军队要搞好现代化，就必须搞好正规化；现代化程度越高，越需要加强与之相适应的正规化建设；随着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对正规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规化建设的总要求仍然是“五统四性”，即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统一的编制，增强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

建国以来，在正规化建设方面，我军是有教训的。由于一个时期反对正规化，使部队的各种规章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有些制度建立了也没有贯彻，条例、条令不完善，管理教育不够严格，致使军队组织纪律性差，政治纪律也差，干部的管理水平和作风也不好。针对这些，1975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后来又进一步强调，整顿军队必须严格整顿纪律。军队干部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首先要从老干部开始，带头遵守纪律。我们这个军队，历来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强调自觉遵守革命纪律。要坚持从严治军，依法治军，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严格按条令条例和法律法规办事，赏罚严明，在严字上讲究方式方法，走上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同时，要把部队管理好，就要提高管理能力，讲究科学的管理方法，提高干部的管理水平，做好人的

工作。

（七）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增强全民国防观念

军队和国防建设，关系国家安危，关系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国人民的事业。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优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未来反侵略战争依然是人民战争，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军民团结，共同战斗，才能战胜敌人。人民战争，是我们的长处，也是我们的优势。因此邓小平强调，要以爱国主义为中心，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要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时刻保持警惕，开展全民国防教育，使全体公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增强国防观念，自觉履行保卫祖国的神圣义务，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国防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安全保障。因此，要坚持精干的常备军与后备力量相结合的方针，大力做好民兵、预备役工作，完善国防动员体制。要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的活动，发展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相互团结、相互支持的大好局面。发扬军民渔水情的光荣传统，坚持军民一致的原则，军队处处为人民着想，不愧为人民的子弟兵，地方也要尊重军队、重视军队。一如既往地关心国防建设、支持军队完成各项任务，是各级党组织、政府和全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密切军政、军民关系的新途径，对促进和加强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建设也十分有利。

总之，加强军队建设，必须按照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上述思想，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把我军建设成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不断增强国防实力，努力适应现

代战争的需要,以保证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十七、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党

——关于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理论

邓小平理论,包含内容丰富的党的建设的理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党。邓小平指出:“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中国的事情要办好,国家要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在现阶段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邓小平在1979年指出:“在中国,在五四运动以来的六十年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时,“八大”提出的

路线是正确的。邓小平说,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如果我们不好好搞,在建设问题上也会栽大跟头,犯大错误。所以,我们既要接受成功的经验,也要接受犯错误的教训,既要善于学习国际的经验,也要善于学习自己的经验。能不能不断地总结经验,避免犯大错误,关键在于党的领导。“过去的革命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在于党的领导,现在的建设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也在于党的领导。也就是说,关键在于党是不是善于学习,学习得好就可以避免犯大错误,就可以少花一点钱办得多的事;关键在于党能否依靠群众,不断地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否则,就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搞好建设。

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执政地位,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作出的选择。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种种艰难险阻,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地位、中国历史的方向和中国社会的面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全面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能领导革命,也能领导改革和建设。在当代中国,没有其他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可以代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因此,任何怀疑、削弱、否定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的观点和做法,都是根本错误和十分有害的。离开共产党的领导,别的政治力量不可能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不可能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

主的发展,都要靠共产党的领导。所以,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四个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条战线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无负于人民重托和希望的执政党。

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就谈不上改善党的领导;不改善党的领导,也不可能正确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党必须善于用改革的精神认真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这是使党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也是党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内在要求。我们决不能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而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思想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

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必须提高党领导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领,这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面临的新课题。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们不懂得、不熟悉的东西很多。全党同志必须认真学习。不仅学习政治,而且要学习经济,学习经营理论,学习现代科学文化,刻苦钻研业务,使自己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不熟悉国情,不了解世界,不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正确认识和运用发展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就不可能领导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全党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保证中央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要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切实改变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否则,不可能解决执政党如何善于领导的新问题。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加强党的纪律。要完善党规党法,加强党的各方面的制度建设,加强国家的法制建设,并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走依法治党治国的路子。

改善党的领导,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最大的政治优势。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用主要时间和精力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建设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和作风上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遇到了许多复杂的情况,我们的工作还不适应,一些地方和单位党不管党、治党不严,纪律松弛,组织涣散,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着种种不容忽视的问题。党必须善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认真研究和解决在自身建设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这已经成为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兴衰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

（二）加强党的建设，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一个法宝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作为执政党，肩负着历史的重任，经受着时代的考验，必须发扬优良传统，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了两场伟大的革命，党的建设有两个伟大的工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之后，又在中国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探索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场伟大的革命。在这场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和执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旧中国小生产十分广大、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社会里，在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和白色恐怖下的城市，建设起一支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这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罕见的壮举。我们党的建设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成为一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党的建设第一个伟大的工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恢复和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制定和执行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组织路线，指导着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开放，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消灭贫穷，走向富强，

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场深刻的伟大革命。在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中,党的建设又有一个新的伟大工程,这就是执政党建设的新工程。这个新工程的展开,是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的。它的继续推进,是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深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而不断前进的。它的成功,是取得“中国第二次革命”胜利的关键。

邓小平提出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这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邓小平倡导的加强党的建设新的指导思想和新目标。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先后作出关于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关于加强廉政建设,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等决定,就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作了重要部署。十四届四中全会又着重就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样,就形成了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整体部署。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面向新世纪,党中央领导全党正在继续推进这个新的伟大工程,就是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全党要按照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

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抗腐防变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大的战斗力，带领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十四届四中全会结合新的实际，提出把我们党建设成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条件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对邓小平在新时期关于执政党的建设新的指导思想和新目标的继承与发展，是全面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共产党建设好的行动指针。

（三）加强党的建设，要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是毛泽东思想党建理论的独创。在现在阶段，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最重要的是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增强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1985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邓小平特别强调说：“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

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今天，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邓小平理论，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这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基础建设，也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

（四）加强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环节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问题，一是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二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是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

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过程中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列宁系统地赋予民主集中制科学内容，并把它规定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积累了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宝贵经验。党在全国执政以后，把它运用于政权建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拓展了民主集中制。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民主集中制的理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条件下继承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并在理论上继续把它推向前进。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科学的、合理的制度。各项具体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都是民主集中制的体现。我们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党章规定，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是：（1）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2）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选举产生；（3）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党的

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是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党的各级委员会向同级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4）党的上级组织要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党的上下级组织之间要互相支持和互相监督，党的各级组织要使党员更多地了解和参予党内事务；（5）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6）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我们党贯彻民主集中制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历史证明：民主集中制贯彻得好不好，关系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和组织建设中的运用。要正确认识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反对家长制和专制主义、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从党内到全国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他说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他认为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实行“四个服从”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原则。这几条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在建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时，他又指出：任何一个领

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一场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更要求我们党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全党必须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中央权威，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放松或削弱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错误的和有害的。各级党委要正确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指导方针：

第一必须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用完成本单位任务的实际效果来检验基层党组织的工作。

第二必须用改革的精神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运用已有的成功经验并进行革新和创造，改进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内容和工作方式。

第三必须严格党内生活，严肃党的纪律，弘扬正气，反对歪风，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基层党组织解决自身矛盾的能力。

第四必须立足于经常性工作，常抓不懈，既要制定切实可行的长期规划，又要抓紧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

各级党委要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成为团结带领群众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战斗堡垒。有了巩固和健全的基层组织，我们党才有巩固的基础，才能经受住各种风浪的考验。

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保证党的路线的连续性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

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邓小平之所以说关键在人,这是因为:第一,正确的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所以,“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要选拔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接班人,继承党的优良传统,使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代代相传,后继有人,后来居上。

第二,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

第三,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

所以,他反复强调要选拔有革命精神和专业知识的年轻干部,选拔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领导机构,使党的队伍充满朝气和活力。他说:“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

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要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聚精会神地把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搞好，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各级党组织解决自身矛盾的能力；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必须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总之，把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建设好，这是中国问题的关键。

（五）执政党的党风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定要坚持党的宗旨，继承党的优良作风，发扬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坚持反腐败斗争，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大问题。要充分认识这个斗争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把反腐败斗争摆在党风建设的突出位置。

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党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有腐败行为的只是极少数。但这极少数党员的腐败，已经引起群众的极大不满。因此，要把反腐败斗争贯串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之中。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多次提醒全党，要反对干部队伍中的不正之风和特殊化，警惕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袭。以后他又多次强调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我们的国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1992年春，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又特别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

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

说到底，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党员要牢牢记住：我们应该而且必须永远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和维护。

（六）加强党的建设一定要重视制度建设

邓小平从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中，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中，作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论断，提高全党对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和党中央提出了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一系列方针原则。概括地说：

——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都要按党章办事。

——健全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党的组织生活制度，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保证党内生活的民主化。

——健全干部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职务任期以及离休、退休等一整套制度，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逐步形成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

——完善党内监督制度，把党内监督同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监督结合起来，把自上而下和自下

而上的监督结合起来,逐步形成强有力的监督体系。

我们要切实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并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之中,保证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胜利完成。

十八、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1997年金秋胜利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坚定、鲜明、强烈地表达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十五大指出：“旗帜问题事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邓小平同志逝世后，全党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指出：“在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历史时刻，必须郑重指出：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是近二十年来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经验，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最可靠的保证。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保持清醒头脑，克服各种干扰，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把我们的认识统一到十五大精神上来，必须牢牢把握这两个“不动摇”。

（一）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关系党和国家的兴衰成败

1、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们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和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邓小平，在治党治国的大业中，首先考虑和提出的，就是制定和执行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因为，这是建设、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证。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逐步形成的。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基础。会议坚决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工作指导方针，确定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并提出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党的基本路线的雏型；会议开始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会议还提出了实行新老交替的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确定以正确的组织路线保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现。所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为制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重申了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深刻地阐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1981年6月，在邓小平主持下，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实事求是

地总结了建国三十二年来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经验教训,维护和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在正确判断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上,总结了十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经验。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的命题。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当代中国建设和发展的主题。

在邓小平于十二大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主题后的五年实践中,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蒸蒸日上,实践使我们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认识大大深化。正如,1987年7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对党的基本路线的主要点的概括。同年8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这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成为党的基本路线的立论根据,邓小平在十三大前夕之所以能作出这些科学论断,这同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紧密相连。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是我们中华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党的基本路线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逐步形成的;同时,党的基本路线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集中表现。

2、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关系党和国家的兴衰成败

邓小平郑重提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曾反复多次说过:“一个中心,两上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什么威胁也吓不倒我们。我们这个党就是在威胁中诞生的,在威胁中奋斗出来的”,“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党的十四大特别强调这个根本思想。

为什么要反复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能动摇?主要之点就是它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这一点已经被历史和实践所反复证明。

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是顺乎民心,合乎民意的正确路线。应当肯定,党的基本路线源于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创造。邓小平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还应当肯定,党的基本路线是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二十年来,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了明显的改善,12亿人口的大国基本上实现了温饱,这是举世瞩目的大

事。广大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靠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才能脱贫致富。否则只能是死路一条，党就会脱离人民群众，人民就会不拥护你，不相信你，就有被打倒的危险。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是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正确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明确规定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自近代到现代到当代中国几代人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即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个历史课题包含着推进传统产业革命和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双重任务。

为实现上述总目标，党的基本路线明确规定：必须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依靠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这四个基本点是必不可少的。由此可见，党的基本路线是强国富民的正确路线。

3、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根本保证

党的基本路线能否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关键是全党从中央到各级党委、从高级干部到普通党员是否真正坚信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在政治上思想上真正解决了党的基本路线“对不对”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变不变”的问题。“变不变”归根到底取决于“对不对”。党的基本路线“对不对”？不仅是主观

意愿的问题，最主要的是要以客观标准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的基本路线之所以正确，归根结底是由于经过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检验，证明它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因此，党的基本路线是建设、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

要使全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根本保证在于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因为，党的基本路线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同时，又是邓小平理论的集中表现。每个共产党员只有认真学好邓小平理论，才能真正弄懂弄通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只有在理论上的清醒和坚定，才有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和持久。

以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就是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认真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掌握它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着重抓住以下基本理论问题学懂弄清：

第一、紧紧抓住和深入领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二、紧紧抓住和深入领会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第三、紧紧抓住和深入领会把握时机发展自己、“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任务；

第四、紧紧抓住和深入领会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基本方针；

第五、紧紧抓住和深入领会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发扬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致力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

我们在学习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还必须认真学习邓小平的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认真学习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革命胆略、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

我们在学习邓小平理论中，必须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紧密联系当前国际和国内形势、任务和全国工作的大局，紧密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和自己的思想实际、工作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澄清模糊认识，提高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提高政治素质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党指导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总体战略、根本指针。它明确规定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中心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和中心任务所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基本方针、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这个总战略所包含的各个要素，都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这反映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正确认识世界的科学成果，也是我们党指导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因此，我们必须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全面地加以把握，不能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也不能孤立地强调任何一个方面。

但是，首要的关键是正确认识 and 把握经济建设在党的基本路线中所处的中心地位。因为作为总战略的整体所包含的

诸要素,在这个整体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经济建设在党的基本路线中处于中心地位,对此丝毫不能含糊,稍有疑惑,就会对党的基本路线发生动摇,这不是个别的、局部性的错误,而是整体的、全局性的错误。对此,邓小平从80年代一开始,便经常地反复地强调。1980年1月,邓小平曾指出:“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

经济建设中心地位的确立,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理论根据和现实根据。

首先,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所规定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之所以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之所以优越于资本主义,是因为它能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最终也取决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到1992年春,邓小平科学地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由此可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共

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就是一句空话。

其次,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指出:“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这是精辟的科学论断。从国内来说,我国自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以来,国内主要矛盾再也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如果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大力发展生产力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那末,在我们这样一个脱胎于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发展生产力这个任务就显得更加紧迫。邓小平曾说过:“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为了解决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必须花费几十年甚至一个世纪的时间,持续不懈地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解决我国发展社会生产力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实现邓小平提出的我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从国际来说,80年代中叶,邓小平正确地概括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这揭示了当今时代的主题。到了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京等地谈话时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

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社会主义中国应该以怎样的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呢？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不仅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社会主义的中国，而且应当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由此可见，经济建设是核心，是解决国际问题的基础。

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就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我们党有过深刻的经验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作指导方针，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一系列新问题。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使各项工作服从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绝不能以任何理由、任何工作冲击和干扰这个中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做好各项工作，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各部门、各行业的工作必须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出发，围绕经济建设进行，自觉树立服从和服务的观念。要从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出发，考虑和开展本部门、本行业的工作，寻找把本部门、本行业的工作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结合起来并为之服务的途径和方法。任何工作都不能片面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把自己独立于经济建设的大局之外，甚至摆在经济建设之上。任何工作都要围绕和致力于经济建设，而不能干扰、背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是说其他各项工作就不重要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外交、国防建设，党的

建设等等，都对促进和保障经济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建设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如果把以经济为中心与做好各项工作对立起来或者割裂开来，势必损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健康发展。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斗争，要深刻理解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的正确估量。《决议》指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是，“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主义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科学论断，正式写入了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报告和修改后的党章再一次重申和强调了这个结论。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国内外一切突发的重大政治事件。在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出现时，邓小平旗帜鲜明指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没有错”，“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80年代末，面对苏东的剧变，邓小平明确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邓小平冷静而又正确地处理国内国际的一些实际的重大政治事件，给我们以极其深刻的启示：国际风云变幻，社会主义事业也不会一帆风顺，今后还可能发生这样那样的事件，我们必须牢记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

应付的方针，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

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邓小平这段话提出了把两个基本点统一起来，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又一个关键问题。邓小平认为两个基本点是互相依存的，相互贯通的。这个科学论断，既是理论概括，也是实践经验的总结。

1、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

恩格斯早就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由此可见，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正确途径，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然而，自从世界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来，对待社会主义社会形成了一种僵化的模式和观念，甚至越来越凝固化、神圣化。我国在50年代搬用别国模式，再加上我们在工作指导上也犯了象“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因此，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生产力发展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人们的思想观念受

到很大的束缚，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难以发挥。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到1985年，邓小平在一次会见外宾时深刻地阐述了这个科学论断，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第一步，到本世纪末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二步，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目标确定了，从何处着手呢？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同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郑重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邓小平这段话正确揭示了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不是在旧体制范围内进行枝枝节节的修补，而是由旧体制向新体制转换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就是革我们自己搞的僵化的社会主义具体体制的命，焕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活力和生机。更不是抛弃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根据我国改革的实践，针对苏联解体的教训，在1991年苏联发生8.19事件后的第二天，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

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邓小平从社会主义正反两面经验极大地丰富了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的重要思想，正确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总之，改革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焕发生机和活力的必由之路。

2、我国的改革开放健康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它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

党的基本路线把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两个基本点，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两个基本点的一致性就在于统一的落脚点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总目标。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离开共产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方向而搞“改革”“开放”，在中国是不会有前途的。中国人民从近百年来的历史经验中认识的一条真理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才能保证改革开放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才能形成全国各族人民为共同理想奋斗的巨大的凝聚力。

3、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右和“左”都是政治概念，指的是对党的政治路线偏离的错误倾向，这种偏离无论是右或者“左”都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在现阶段，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最主要的是对党的基本路线的态度。党的基本路线是一

个中心，不是两个中心；是两个基本点，不是一个基本点。在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个重大问题上，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

右的表现主要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政治动乱。“左”的表现主要是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阶级斗争为纲”取代以经济为中心。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正确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坚决排除了“左”和右两方面的干扰，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经受住了各种考验，保证了党的基本路线的全面贯彻执行，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低潮的情况下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保持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的良好的发展势头，这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必须全面理解邓小平关于反倾向的正确思想，坚持反倾向的全面性和科学性，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毫不含糊。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经验，必须牢记。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的思想根深蒂固。所以，邓小平在反倾向问题上，明确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的是防止‘左’”。因为“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强调反倾向的重点是“左”的错误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从党的历史来看，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时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要是“左”的错误，这个历史教训永远不能忘记。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来看，妨碍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的，仍然主要是“左”的东西，包括僵化的观念和体制。从“左”的特点来看，“左”带有革命色彩，

拿大帽子吓唬人，好像越“左”越革命，“左”比右带有更大的迷惑性，它不仅易于泛滥，而且又特别难以纠正。从“左”的社会根源来看，封建主义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我国渊源流长、盘根错节，这是“左”的错误赖以存在的深刻的社会历史基础，加上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左”的错误更具顽固性，屡反屡犯，至今还不可能绝迹，反对“左”的错误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深刻认识这点，目的在于使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密切结合当前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提高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解放思想，同心同德，把经济建设的各项事业搞上去。

（四）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决维护全党全国的工作大局

总结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决维护全党全国的工作大局。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一切工作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改革是发展的动力，离开改革，发展无从谈起。发展和改革是稳定的基础，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邓小平曾尖锐指出：“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由此可见，改革、发展、稳定三者是辩证统一的，不能缺一。只要我们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相互协调和互相促进，就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富裕幸福。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深刻认识我们党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的基础

上,确定“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这一总揽全局的重大指导方针,这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这个决策是必要的、正确的。

这个重大指导方针,充分体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要求。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在促进发展这个主要环节上,这包括: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促进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两个基本点概括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保持稳定两大方面,这包括:以国有企业为重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巩固和发展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重点放到提高成效上来;为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保持稳定。这样,使我们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落到实处。

这个重大指导方针,完全符合 1992 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从当前国内外情况来看,我国面临着改革的发展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和实践经验,创造了更多方面的有利条件;国际形势总体趋于缓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我国在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推动全球和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这一切又为我国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党的十四大强调了这个重要思想。党的十五大再次强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指出:“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

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

十五大以来,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集体的领导下,全党认真贯彻这个指导方针,紧紧抓住机遇,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都在努力维护这个工作大局,使我们的整个工作进一步取得了主动,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五)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在于我们党,首先在于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

1957年前,毛泽东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个论断的正确性早已被我党的长期斗争实践所证明。邓小平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上述论断,1992年初,他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这个“人”,主要指“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省部级以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尤其是政治水平如何,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为此,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高级干部特别是省部以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不仅要努力成为有知识、懂业务、胜任本职工作的内行,而且首先要努力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

省部级领导干部应当成为治党治国的政治家,是人民的

期望,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要求。省部级干部是国家和党的栋梁。作为工人阶级先进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除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外,丝毫没有自己的私利,这是党的根本宗旨所规定的人民利益和党的宗旨的一致性,要求省部级干部应当成为实现人民利益和党的宗旨的政治家,而绝不是资产阶级政客或者是以权谋私的小人。

省部级干部是实现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的决定力量。中央对省部级干部作出了明确的要求:坚强的党性和宽阔胸襟、组织能力和领导艺术、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这充分表达了“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的完整概念,因此,能否做到这几项要求,不是个人问题,不是一般问题,而是关系到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问题,关系到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成败问题,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历史发展总趋势的要求。归根到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业能否最终实现的大问题。

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青年是我们事业的未来和希望。现在的青年是跨世纪的一代。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用邓小平理论教育广大青年,这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业的前途和 21 世纪中国面貌的大事,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长远大计。

(六)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昂首阔步奔向 21 世纪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是在首都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的奇耻大辱中进入 20 世纪的。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幸福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自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领导各族人民为中国社会的进步,

做了许多事情。总起来说，正如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就是三件大事：第一、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第二、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三、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件事情还正在做。”今天，我们正以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自尊和自豪，以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华民族的自信和自强，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昂首阔步地奔向 21 世纪。

邓小平为我们沿着这条道路走向新世纪描绘了宏伟的蓝图：到本世纪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下世纪 20 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建立 100 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到下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达到第三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的最后，号召全党：“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不屈不挠，艰苦奋斗，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目标已经明确，道路已经开辟，只要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沿着十五大指引的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就一定能够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责任编辑 春 秋

封面设计 张志明

ISBN 7-80136-244-6



9 787801 362445 >

ISBN 7-80136-244-6 /D ·

定价：12.00